

范文瀾著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東北書店印

627.74

535

v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范文瀾 著

36022
漢子

東北書局印行

1948.2.



~~25849~~



3 1764 9839 6

目錄

引言

一、太平革命準備時期——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

二、太平革命勝利時期——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前期革命形勢——飛躍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軍事問題——外交問題——政治思想與宗教問題——宗教——私有財產——婦女與婚姻

三、太平革命衰敗時期——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前期革命形勢——防禦

陳李聯合作戰——陳玉成安慶保衛戰——李秀成南京破圍戰

後期革命形勢——被圍失敗

左宗棠攻陷浙江省——李鴻章攻陷江蘇省——曾國藩會同荃攻陷南京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戰略研究

華岡

黑暗中的躍步

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

北伐和西征

楊韋事變以後的太平軍

戰略的結論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初稿）

范文瀾

洪秀全前清士階級，到今年，已流落一百年了。一八四五年，一個村塾的塾書教諭，提出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發動了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太平革命，洪秀全也成爲青年民主革命運動的先驅者。

爲要紀念這位先驅者，寫成這篇初稿。不成問題，觀點、方法、以及材料的審核，編章的組織、缺點錯誤是管不住的。正因爲這樣，我把它發表了一部份，要求同志們從各方面批評它，幫助我改正，二三稿四稿到五稿定稿，我感切的答覆着。

——作者

引言

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創造了世界市場。自從南京條約訂立，五口通商，中國以半殖民地資格，進入世界市場了。閉關時代，人民受封建剝削，已經極其痛苦。鴉片戰後，又加外來的資本主義剝削，這種新式剝削，破壞中國手工業，使數千年來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的社會機構開始在某些地區趨於瓦解，更嚴重的是促進滿清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猛烈增加封建剝削的強度，繁重得難以負擔的舊捐稅上，又加上新捐稅，填補賠款和鴉片貿易的虧額。鴉片戰後十年間，中國社會驟然遭遇這樣

史無前例的大變動，不論南方與北方，城市與鄉村，全部震盪起來，舊的財政、經濟、政治、禮教各種制度，愈更成爲中國人民的禍害，新的人民的反對建革命運動，就在這樣時代條件之下是必然要發生了。而揭開這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就是馬克思稱爲『處於社會革命底前夜』的太平革命。

那時，以英國爲首（它佔中國進出口總額四分之三）的外國侵略者與滿族皇帝爲首的封建剝削者，給予人民最大的痛苦，試看下列事實，英國的鴉片、滿清的暴政，顯然是痛苦的源泉。

英國輸入紡織品價額表（單位十萬鎊）

	棉織品	毛織品
一八四二年	四七〇	一四六
一八四三年	六五五	四一七
一八四四年	一、四五七	五六五
一八四五年	一、六三六	五三九
一八四六年	一、〇二四	四三九
一八四七年	八五〇	三八九

一八四四年——四六年，輸入額增長，到四七年開始低落，此後十年，輸入額平均說來幾乎沒有變動。這說明英國布疋對中國紡織手工業起了破壞作用，但不是嚴重的。輸出方面，中國絲茶逐年增長，在中英合法貿易上總是佔優勢，足夠抵補布疋及其他商品的價值而有餘。英國對華經濟侵略，主要依靠可恥的鴉片貿易，從南京條約成立時起，鴉片貿易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大量輸入中國，每年換

取等於數百萬金鎊的銀兩出口。從一八四〇年——五〇年，英國輸入鴉片箱數如下：

一八四〇年	二〇、六一九箱
一八四二年	三三、五〇八
一八四四年	二八、六六七
一八四六年	三四、〇七二
一八四八年	四六、〇〇〇
一八五〇年	五二、九二五

十年間鴉片輸入增加一倍以上，消費者主要是統治階級中人，他們行施各種搜括方法，強迫人民補償耗失的銀兩，鴉片貿易繼續上漲，正與政治愈益腐朽，剝削愈益殘酷，銀源愈益枯竭，人民愈益困窮成平行線發展。當時全部政治機關兇暴貪污，比鴉片戰前更甚，連會國藩那樣殘忍的漢奸，也不能不認爲『百姓顛連窮苦』，舉出一些『民間疾苦』，勸告咸豐帝『務思所以更張之』了。照會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說：第一，是『銀價太昂，錢糶難納』——『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每石平均價三千文），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九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州鄉竭全力以催科，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拿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鄰里，真有日不聊生之勢』。這裏所謂小民，當然不是地主富農，這種人或與官吏勾結，朋比爲奸，或放高利貸，兼併土地，與其說受加賦之害，不如說受加賦之利，土地集中現象在鴉片戰後特別緊張，地主富農因

中小農破產，經濟反趨繁榮，鴉片銷路也順利擴張了。那時候中小農民生活的窮困是難以形容的，例如江浙產米地區，米一石平均值錢三千文。銀價在道光初年，每兩換錢千一二百文，道光十八年，換錢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京中換錢約二千文，外省換錢二千二三百文，農民賣米所得，以錢折銀，實際減縮一半左右。官府徵收地丁，定價銀一兩，道光十九年，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後漸增至二千餘文以迄二千八九百文，總比市價高數百文。農民完納地丁銀一兩，歷年遞增至需賣米一石，再加漕米折銀，每畝又需賣米數斗。平常年景，一畝產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完納地丁漕米，已經剩餘無幾，暫時拖欠就遭血肉狼狽的慘刑，被產更不可免，因此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壓縮自己的生活費，限於豆麥蠶絲紡織等副產範圍內，一遇天災疾病及其他意外事，副產不夠養生，當然成爲高利貸者的犧牲品。佃農僱農生活尤其惡劣，上等佃戶耕田二十畝，每畝所費種籽、肥料、牛具、農器，農忙幫工等約一千文，春季缺糧必需填補，一般向當地富戶借貸錢米，秋收時加倍償還。每畝產米不過二石，還田主租米二十石，還債主錢四十石，米十幾石，剩餘極微。經營副業，又需借入米錢，支付重息。中下等佃戶負債更多，終身不能脫離高利貸的盤剝。僱農工資通常每年十千文，無力娶妻成家，依附僱主過奴隸生活，是農民中最苦的一級。因地主富農急速發展，中小農戶繼續破產失業，多數轉入僱農或流氓羣中，人口過剩成爲社會極嚴重的危機，止有革命才是出路。

第二是『盜賊太衆，良民難安』——『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專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

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這裏所謂盜賊，實際止是饑民抗富戶，真正盜賊，都是全部行政機關，從官吏到兵役，無不「焚斃民房，訛索財物」，借口抽盜，實行燒殺搶奪，殘暴遠非普通盜賊可比。

第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人民控告官吏役，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一家久訟，十家破產。往往有纖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牢圍，令人聞之髮指者」。這裏所謂冤獄，實際就是法律保障貪污。統治階級的法律必需偽裝一些公正面目，才能欺騙人民，現在真面目完全暴露，法律喪失信用，「令人髮指」的原因在此。

會國藩代表一部份缺乏政治勢力的有產者訴苦，社會極大多數窮民的冤苦，他是不理會的。但僅就這三條說來，滿清官僚政治的黑暗，農業生產的摧殘，是够證明人民要求革命的正當了。他在「謹汰兵疏」裏又說「兵伍之情狀，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各省皆然。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滿清養綠營兵七十萬，八旗兵二十五萬，全國分駐一百萬武裝強盜，配合號稱官員吏役的文法強盜，共奉滿洲皇帝爲渠魁，一致向人民敲剝，悍然不顧。這樣兇惡的一具統治機器，止有對滿洲貴族漢奸，地主，富農，外國侵略者有存在必要，從人民方面看，除了搗毀它，再沒有自救的道路。

中國人民反抗滿清，從來不曾停止，鴉片戰爭前後，南北各省反滿秘密結社，非常發達。被統治階級發覺的已經是名號繁多，實際並不止這些。例如咸豐元年七月戊子上諭「近來四川之囑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齋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安徽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多有」。事實上捻黨散

佈河南安徽山東一帶，爲北方白蓮教天理教兩次大起義以後新起的大勢力，齋教散佈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一帶，爲兩宋陳教（北宋末陳教主方臘起義）的流派，都不局限於一省。勢力尤大的天地會（又稱洪門，三合，三點），分長房福建，二房廣東，三房廣西，四房兩湖，五房浙江，會員佈滿南中國，以『反清復明』爲共同宗旨。其他小派別，單是湖南一省就有串子會，半邊錢會，一股香會，紅黑會，紅蓮教，黑蓮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各省秘密結社大致相類，這種散漫小規模的結社，不論他思想如何愚昧，方法如何落後，本質是窮苦人民反抗統治階級的一個力量。從鴉片戰爭起，大小會社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發動武裝起義，較著稱的有如下列：

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陽縣人鍾人杰聚眾數千人起義，自稱鍾勤王，並豎都督大元帥紅旗，次年戰敗被殺。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岡州人曾如炷起義。

一八四四年——台灣嘉義縣人洪協等起義。湖南安陽縣人楊大鵬等聚眾抗糧起義。

一八四五年——清山東巡撫發兵捕殺捻黨。

一八四六年——雲南永昌回民起義。湖南新田縣人王宗獻起義。江蘇昭文縣人金得順等起義。

一八四七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得等起義，進攻全州，湖南廣西天地會員準備響應。

一八四八年——清廷諭兩廣，湖南，江西各督撫嚴奉天地會員。

一八四九年——廣西大饑，鄉村間饑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借貸錢米。富戶辦團練，藉口保全身家，請州縣官出示，特准對饑民『格殺勿論』。統治階級的殘忍性完全暴露，天地會和饑民紛紛起

義。揭「官逼民變」、「天厭滿清」、「朱明再興」、「替天行道」、「劫富救貧」等旗號，攻佔城市，誅戮官吏，聲勢大振。廣西一省起義軍多至數十部，每部有衆數百人以至數千人，其中大部如湖南新寧縣天地會首領李元發，佔據廣西、湖南、貴州三省邊境，三省天地會起兵響應，元發遭清兵圍攻，戰敗被殺。又廣西賓縣盜匪張嘉祥（降清後改名張國傑），迎合饑民心理，提出「上等的人欠我錢，中等的人得覺眼，下等的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四句口號，大得貧苦人擁護，在各部中兵力最強。不久張嘉祥戰敗，投降清軍，咸太平天國的勁敵。當時清兵腐朽不能作戰，正是利用天地會山堂分立，缺乏統一指揮，盜魁貪得小利，並無政治思想等間隙，居然收各個擊破，壓平反抗者，藉買反革命走狗的功效。可是太平革命軍與其他起義軍不同，它有堅強的軍事組織，統一的宗教信仰，顯明的政治綱領，強烈的民族意識，總各部起義軍失敗之後，衝破清兵包圍，展開偉大場面，這決不是偶然的。

一、太平革命準備時期（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一八五

〇年（道光三十年）

商品，基督教，大砲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整套工具。基督教裝着偽善的面貌來掩護掠奪政策，開大砲屠殺是侵略者的另一面貌，總目的在暢銷商品，主要是鴉片。馬克思說「歷史之所以需要麻痺中國人民，爲的是要把他們從歷來的愚昧狀態中喚醒起來」。的確，鴉片使中國統治階級愈益腐

欄，對中國人民却「不會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驚醒的作用」。太平運動採用基督教某些教義作爲反封建思想的根據，這也是因鴉片而驚醒的一種表現。

一八〇七年（嘉慶十二年），英國傳道會派瑪禮遜博士到廣州傳教，譯耶教聖經成華文。他的第一信徒梁亞發著一種傳道書叫做「勸世良言」，在路上分發宣講。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到廣州應秀才考試，無意中得「勸世良言」。秀全甚天資聰明，熟讀經史很有才學的青年士人（二十五歲），他在科場屢次失意，激起反抗思想，談罷歸家，裝瘋病四十餘日，說自己上天堂受了上帝的天命。這是歷史上「符瑞」「受命」的舊方法，與魔教拜日月神白蓮教拜彌勒佛，同一意義，止用作號召民衆的旗幟。秀全病中吟詩有「手揮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坦網，收殘奸宄落天羅」等句，純屬政治性質，並無絲毫的宗教色彩，洪秀全與基督教的第二步關係僅利用上帝耶穌兩個名詞官能自己受了天命。

一八三八年，四三年，秀全兩次應試，又遭失敗。那時候滿清政治軍事的全部能力在鴉片戰爭中完全暴露，他決心爲彙科舉，實行起義準備。他和同鄉馮雲山等研究勸世良言，附會書中詞句，證明本人確實接受了上帝耶穌的天命。他創立上帝教，勸人在上帝面前悔罪，不事邪神，不行惡事，遵守天條。秀全雲山都是貧苦塾師，他們不顧失業的困難，把孔子牌位毀棄，結果學童驚散，書館停閉，不得不離開花縣本鄉，遠赴廣西傳教。封建社會的「至聖」「孔子」竟被看作邪神，這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一八四四年，秀全雲山到廣西貴縣傳上帝教，農民百餘人受洗禮入教。一八四五年，雲山轉入桂

平縣紫荊山向贖工宣傳，秀全回花縣製造傳教文書。原來上帝教止有一些簡單教義，主要是不拜偶像邪神，獨拜真神上帝，信奉耶穌，可得天堂永久快樂。這種教義不能號召廣大羣衆，需要理論的補充，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兩篇，確掌握了窮苦人民的心理，初步發動反抗的熱情。救世歌勸人要作正人，切戒「淫」，「忤父母」，「行殺害」，「爲盜賊」，「爲承親」，「賭博」，六個不正行爲。他在戒條裏輸入政治上的平等思想，說「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主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視之皆赤子」。天子的稱號和祭天的特權。一向歸皇帝獨佔，人民是皇帝的奴隸臣妾，「僭」號「使」權便是大逆不道。人民都自稱天子，都有權拜自己的天父，恰恰破壞了封建制度的等級精神，因爲人人都是兄弟，殘虐成性的統治階級自然是「嗜殺人民爲草寇，到底豈能免禍災」。人民殺草寇完全是正義，戰爭所引起的禍災完全是草寇的罪惡。

醒世論裏又灌輸經濟上的平等思想。他根據「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這個原則，說「天下（世界）多男人，盡皆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併之念」。顯然，那些滿洲人，官吏，地主，高利貸者剝削吞併，都是反「上帝之真道」的妖魔，必需殺逐，才能「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變殘奪鬪殺之世爲公平正直之世」。他引述孔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是謂大同」一段話，想實現「有無相恤，患難相救，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男女別塗，舉選上德」的太平世界。這種主觀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稱爲「中國的社會主義」）要求，根據無貧富之分的新原則重新分配財產，制定天朝田賦制度。當馬克思在歐洲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時候，洪秀全提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雖然是空想，却顯示出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氣魄。

政治上經濟上兩大平等，是在封建壓迫之下困苦不堪的廣大人民主要是農民迫切要求，也是中國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救世醒世兩篇論文，剝去它的宗教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本質。太平革命運動就在這個平等思想推動之下壯大起來。

『太平天國起義記』載當時秀全對族弟洪仁玕的秘密談話說：

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洋海爲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

又說：

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交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這是我心中之大願也。

這是秀全的民族平等思想，一八四六年，秀全依據這個思想作原道覺世訓，覺世訓是指出職圖目標的論文，它反覆說明：『閩羅妖乃其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姊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者也』。所謂閩羅妖，實際就是人間的滿洲皇帝，文中所謂『閩羅妖之妖徒鬼卒』的各種偶像，就是人間的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賊。統治者口口聲聲責備人民『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應該感戴皇恩。覺世訓却說上帝造天地萬物，保佑人有衣有食，人明明沾皇上帝的恩典，那些邪魔敢冒天恩，該誅該滅，那些感戴那魔鬼的人是一良心死盡，大瞞天恩，究與妖魔同犯反天之罪，何其愚哉。他把皇上帝與閩羅妖對立，勸告人民脫離妖魔的迷惑，獨拜真神皇上帝。又把皇上帝與人間皇帝對立，認爲『他是何人，敢視然稱帝，妄自尊大』。在迷信神權主權的社會裏，給人民一種勇氣敢於反對偶像

閻羅妖及皇帝，不管勇氣的來源出於宗教迷信，到底起着革命的作用，就宗教說，一神教比多神教拜物教也是大進一步。

醒世、救世、覺世三篇的製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論基礎。後來同盟會倡導三民主義，遠源也是這三篇。

一八四七年，秀全離花縣到廣州嶺拜堂從美國牧師羅孝全學耶穌教義，得讀新舊的聖經，他學了些對上帝禮拜的儀式，就去廣西尋馮雲山，在紫荊山設立上帝會機關，共同製定上帝教各種儀式及十條天條。它把人生日常動作，都表現為一種宗教儀式與上帝聯繫起來，教徒集會禮拜有讚美上帝詩，入教受法有悔罪奏章，朝起晚睡有拜上帝祈禱文，吃飯有感謝文，其他如災病、喜慶、喪葬、生日、滿月、迎親、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事，都有祭告上帝奏章。禱文大意不外「祝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誅滅妖魔，萬事勝意」，「今世見平安，昇天見永福」一類免禍得福的願望。統治階級中各個等級都有權壓迫人民，因之幻化為各種偶像鬼神都有權血食，上帝教集中禍福大權在一個皇上帝，也就是止承認一個人民自己的權力，這些迷信瑣碎的儀式，却成為組織革命羣衆的重要方法。

11
十條天條模倣摩西十誡，前四條屬宗教信仰，後六條即救世歌所舉六不正的條文規定，在平時當作教徒的生活法則，戰時變為軍事紀律（上帝教徒死後不用棺木，上用布帛裹屍體，也是為戰爭便利），天條比禱告儀式有更大的組織作用。

上帝教具備了理論和組織，派人四出宣傳，教徒人數大增。秀全與雲山等寫奏章祈禱上帝，秘密

蓄髮，選擇紫荊山險固地方作根據地，聚集會衆準備起義。爲要鼓勵會衆的漆妖勇氣，秀全率馮雲山等往象州搗毀甘王廟。甘王是殺母，貪暴淫亂的著名鬼神，象州人怕它作怪降禍，祭祀非常虔敬。秀全入廟宣佈甘王十大罪狀，舉大竹杖擊毀神像。從此秀全威名大振，入教人愈衆。上帝教徒到處破壞廟宇偶像，宗教信仰轉成宗教鬪爭。地方紳士認爲拜會謀叛，起團練擒獲雲山等送桂平縣獄，會衆籌集數百串錢救雲山出獄。宗教鬪爭轉成政治鬪爭。一八四七年，上帝教起義準備初步完成了。四八年至五〇年，上帝教與團練鬪爭愈益尖銳，起義準備成熟而爆發了。

一八四三年秀全創教，四四年到廣西傳教，四五年製造宣傳論文，四七年定組織規章，建立起義根據地，開始革命行動。前後五年，上帝教竟成有實力的革命團體。五〇年起義前，以桂平縣紫荊山爲中心，西到貴縣，東到平南，藤縣，南到博白，陸川，北到武宣，象州。在黔鬱兩江流域的村落和山嶺裏，都散播了上帝會的種子。這樣迅速的發展，主要由於滿清統治腐爛不堪，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主觀方面利用宗教迷信推行平等思想與組織，配合了客觀的革命要求。

一八四八年以後，上帝教與地主武裝團練進行着激烈的鬪爭，正如李秀成自傳所說「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團練與團練一夥，各自爭氣，各自逞強，因而逼起」。在鬪爭發展中，洪秀全馮雲山二人組成的領導核心當然需要擴大，陸續加入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四人，最後加入洪大全，成立七個人的領導集團。這個集團的結合與分裂，決定太平革命的勝利與失敗，這裏就必需敘述七人的階級成份及簡史。

洪秀全——廣東花縣客家人。中農家庭，父兄耕田謀生，家境窮困。秀全七歲（一八一九年——

嘉慶二四年）入塾讀書，聰明異常，五六年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父兄和親族都希望他科舉成名，十六歲因家貧失學，助父兄耕田。十八歲（一八三〇年）受聘爲本村塾師；直到三十一歲（一八四三年）創立上帝教以前，不會離開村塾教師的職業。一個讀經史多年，功名心極重，屢次應試得不到秀才的失意人，悲憤不平，在鴉片戰爭後，走向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他的學問知識可以創教作教主，但實際傳教的是馮雲山，領導羣衆的是楊秀清，教主與教徒中間隔着一個媒介，這使他脫出簡單的塾師生活，又進入高高在上的教主生活，不能積累起豐富的政治、軍事經驗去實際領導太平革命。

馮雲山——花縣客家人，與秀全同窗，也同是有才學考試失意的窮苦塾師。秀全創教，雲山首先受洗。一八四四年，二人到廣西貴縣傳教。不久，秀全歸家製造宣傳論文。雲山留桂平紫荆山，親身挑泥挖土，充當苦工，向附近各山燒炭工人，礦工及農民宣傳新教。到四七年秀全回紫荆山時，信徒已有數千人，造成雄厚勢力，號稱「拜上帝會」。二人共訂宗教儀式及天條，開始作起義準備。雲山被團練捕獲押入縣獄，秀全回廣州設法營救，楊秀清等燒炭工人等集錢數百串充賄賂，四八年初，雲山得釋放歸山。教徒人人歡欣，即時殺牛宰馬，獻祭上帝，感謝天恩。雲山出獄後往花縣尋秀全，四九年六月才同行歸山。他是上帝會主持者，離會一年以上，不會指定代理人，會衆無人統率，發生分裂現象，這是極可惋惜的。

楊秀清——桂平縣平隘山客家人。世代以燒炭種田爲業。秀清幼年喪父母，曾離家流蕩，五口通商前，結夥伴護送洋貨，交結許多兩廣江湖土豪客。上海開埠，廣州國際貿易衰落，秀清失業歸家，

仍作燒炭工人，他『識字無多，奸譎異常』（『賊情彙纂』），所謂『奸譎』，就是他的閱歷和智謀高出一般人。馮雲山出獄回花縣，會衆發生動搖，楊秀清自稱上帝附身顯聖，發布號令，團結會衆。這在當時也還是必要的手段，秀全回來，不得不追認聖言，從此代上帝傳言的大權專屬秀清。洪、馮都是廣東籍，不及秀清與會衆有鄉土關係，再加上帝附身，秀全要賒地聽命，甚至受投資，秀清權力在會衆中提高到第二教主的地位。馮雲山不幸早歿，秀清掌握軍事政治權全部及宗教權半部，秀全權不稱位，潛伏着後來楊韋內訌的禍根。

蕭朝貴——武宣縣農民，破產流落，糾合勇士上山，護送往來商客，與楊秀清結識，約爲義兄弟。廣州商業轉移上海，楊、蕭失業，同入上帝會成羣衆首領。秀清稱上帝附身，朝貴稱耶穌附身，後來都被洪秀全承認有代言權。秀清多智謀，朝貴忠實坦率，勇敢剛強，何鋒第一，代表農民的革命性。楊、蕭關係較深，秀全妹宣嬌嫁給朝貴，增強洪、楊兩方的結合。朝貴在攻長沙時戰死，與馮雲山早死同是重大的損失。

韋昌輝——桂平縣金田村人，地主兼典當商，爲一縣首富，捐得監生名目，出入衙門辦事，又是豪紳身份。一八四九年，廣西饑民發動分糧，富戶多破家，昌輝獨能慷慨施予，得本縣一部份民衆擁護。上帝會勸昌輝入會，借他的神宮名義和資財，組織保良攻匪會，掩護革命活動。他出身剝削階級，貪污官吏而爲謀反，被迫參加金田起義，在太平軍領導集團中是唯一壞份子，後來楊韋內訌，大局敗壞，他是主要負責者。

石達開——貴縣北山里客家人。石家充當地土豪大姓，人口多，富有財產。達開讀書有才志，文

武備足，加入保良攻匪會，同謀革命。韋、石二人都是當地多年紳富，各擁有一部份羣衆，他們對上帝會關係較淺，在領導集體中地位也較低，因之遠開雖是第一等軍事政治人才，却不能取得洪、楊的絕對信任。

洪大全——湖南衡山縣人。他在供詞裏自述『自幼讀書作文，屢次應試，考官不識我文字，屈我的才，就當和尚。還俗後，又考一次，仍未取進。我心中忿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天下地圖，都在我掌中，古來戰陣兵法，也都留心。』他和洪秀全一樣，應試失意，轉向革命。秀全接觸一些西洋文化，創造平等思想的上帝教，大全生長在內地，止能組織舊形式的天地會；自然，上帝會是有前途的。可是天地會勢力浩大，大全遊行兩廣兩湖各地，結識山堂首領，擁有廣泛的羣衆。上帝會是新起的，一個地區的團體，羣衆基礎遠不及天地會。金田起義後，大全以天地會大首領軍事專家資格前來合作，上帝會推尊他爲天德王，居次於洪秀全的地位；是有政治意義的適宜處置。洪大全的眞姓名是焦大，參加起義後，改稱萬大洪。『朱』、『洪』、『萬』都是天地會的貴姓；（天地會員尊奉萬雲龍爲開山始祖）。他對天地會用萬大洪姓名，爲的便於號召會黨，對上帝會又用洪大全姓名，表示與洪秀全有兄弟對等的關係。一八五二年（太平天國二年咸豐二年）萬大全在永安圍城中，用『天德』年號頒發告示，對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人民號召『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救民於水火之中』，全篇不見一句宗教語，與上帝會開口必稱天父天兄顯然不同，太平天國用陽曆，天德仍用陰曆（但承認太平曆），太平天國領導人稱王，萬大洪自稱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又有都督大元帥稱號），不受天德王名義。天地會沿用『天德』二字以爲理想中小主的年號（起於康熙時張念一奉

朱三太子起義），非朱姓的起義人多自稱大元帥（如一八五〇年廣州發現天德二年漢大明統兵大元帥黃告示），萬大洪即洪大全，是天地會首領毫無疑問。他承認『奉天承運太平天國』，洪秀全對清詔書裏，也自認『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在復明反滿一點上，天地上帝二會是可以合作的。

以上七人，從團結方面說，在太平天國名義下，一致反對滿清統治者，農民，手工工人，運輸工人，會黨，流氓，以及一部份失意的士人，被欺壓的地主商人，都有代表參加了這個領導集團，形成龐大無比的革命勢勞。滿清首席軍機大臣賽尚阿在永安戰敗後，感到『此賊不是尋常的賊，總願旁人不要同我一樣才好』，這就是團結所表現的威力。但從紛歧方面說，首先是上帝天地二會存在齟齬痕。上帝會崇拜一個真神，楊秀清代真神發言，因之楊秀清等於真神。天地會標『反清復明』為宗旨，並非宗教團體，洪大全在自述裏說『妖術行爲，古來從無成事的』，他不能聽從楊秀清指揮，可以推見。其次是上帝教本身，洪馮爲一組，楊蕭又爲一組，洪馮創教，楊蕭代上帝耶穌發言，宗教領導二元化，隱藏着分裂的嚴重危機。韋石實際上帝教信徒，輩被迫參加，石『讀書有大志』在一定時機下，韋可以爭權內亂，石可以負氣獨立，簡單的宗教迷信是不能束縛他們的。洪馮蕭三人早死，洪楊韋石四人間紛歧的因素繼續發展到分裂，蓬勃的太平天國也就由衰弱而至於崩潰了。

太平革命的基本羣衆，在金田起義時，一般是廣西人，客家人，上帝會人（教徒總數約三千人）。按職業區別，有下列二類。

第一類羣衆：

燒炭工人——上帝會主幹之一，首領楊秀清，蕭朝貴。上帝會人多數燒炭爲業，俗稱爲炭黨，集中地在桂平縣平隘山。

贛工——道光年間，貴縣招集客家人開掘銀礦，馮雲山入北山里龍山中，宣傳上帝教，成爲上帝會主幹之一。起義參加者約千餘人。

客家農民——廣西地廣人稀，廣東或鄰省客家人多遷來墾田謀生。客家村落不及本地土人村落強大，常被土人掠奪，彼此感情極惡，往往尋仇械鬥。一八五〇年，貴縣土客發生大械鬥，客家戰敗，男女老弱三千餘人棄田產逃走，隨北山裏贛工隊加入金山起義，成爲主幹之一。

這一類工人農民數千人是太平軍最基本的戰士。其他陸續參加的，正如李秀成自述：「從（入教）者俱是農夫之衆，寒苦之家，太平軍中農民佔最大多數，不限於客家人，也不限於先入上帝教，他們的共同信仰是『同家食飯』、『自由平等。』」

第二類羣衆：

章昌輝部屬約一千人，隨昌輝參加起義。這羣人有農民，商人，流氓，後來一部份結成革黨。

變兵——金田戰前一天（十一月二十八日）清軍中客家軍人數千反清加入太平軍。

會黨——金田起義，洪秀全允許三合會首領八人率部加入，條件是同拜上帝及遵守會規（天條）。其中七人嫌會規太嚴，相率退出。獨有羅大剛愛太平軍的紀律及教義，改奉上帝教。此後，「秀全誠其部屬不再收容三合會人物於其軍中，惟其甘自改變舊習而遵從真道者始行納之」（韓山文太平天國起義記）。

交通運輸業失業者——鴉片戰前，廣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貨經兩條大路，一路起廣州經大庾嶺沿贛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廣州經南風嶺達湘潭。容闈『西學東漸記』說『湘潭及廣州間，商務異常繁盛，交通皆以陸，勞動工人肩貨往來於南風嶺者不下十萬人』。兩路水陸運輸維護商旅店，商販等業及依附爲生的人數當不下百萬。商業中心移到上海，兩廣嶺湘驟增百萬失業者，腐朽的社會是經不住這個地震般的劇變的。他們要求生活，就必須反抗社會舊秩序，參加太平軍的如楊秀清、蕭朝貴、吳如孝（肖顯王）、羅汝芳都是這一類人，其餘不知名的當不在少數。不過天地會影響遠比上帝會大，萬天洪告示，主要就是對這羣失業者發出號召。

被迫參加者——太平起義記：『清軍戰敗，遷怒於新墾居民，焚燒一二千舖戶而掠財物，且又捕殺居民多人，故加以造黨或助逆之罪。此等殘酷行爲令人民憤激不勝，許多人留在家中本欲拜上帝而不願加入革命運動的，至是迫得離家而投入洪軍』。

這一類人品類較雜，但在宗教信仰軍事紀律的統一領導下，也成爲重要的革命戰士。

以上兩類到金田起義前後，總數已達萬人。『這是堅強統一的團體，具體政治思想，組織領導集團，基本羣衆，人民同情擁護等必要條件，從劉教到起義不過八年，準備完全成熟。容闈說『予意當時即無洪秀全，中國亦必不能免於革命』，自然，革命並非少數人的製造品，但洪秀全能首先提出並實行反封建革命，雖然因幼稚錯誤而不免失敗，他個人所起的倡導作用，還是不容否認的偉大成就。

二 太平革命勝利時期——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起義至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二月攻克南京，革命形勢飛躍的發展；後期從咸豐三年二月建都南京至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八月楊韋內訌，革命陷入停滯狀態。從飛躍到停滯，完全由於領導集團裂痕的加深與戰略指導的錯誤，滿清方面却因此獲得重新調度反革命力量的機會。

前期革命形勢——飛躍

上帝教徒到處搗毀廟宇偶像，與地方紳士衝突日趨激烈，「各教徒感覺有聯合一體共禦公敵之必要。彼等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爲現金，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產制度，人數愈爲加增，而人人亦準備隨時可棄家集合」（太平天國起義記）。革命羣衆的鬪爭情緒高漲到如此程度，道光三十年六月，太平軍在紫荊山前金田村，公開豎立義旗，陸川、博白、花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日起事。十月，各地會衆到達金田。十一月，大破清軍。咸豐元年閏八月攻克永安州（蒙山縣），建立太平天國。

太平軍駐永安城半年，頒行各種制度，建國規模大體具備。秀全被推爲太平天王，再由天王大封官職。王是最高官職，分四等，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列一等，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列二等，翼王石達開列三等。「以上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太平天國政制，軍制，曆法都是馮雲山訂製，他當然知道節制權應屬天王，但楊、蕭取得代天父天兄發言權，事實上秀全早受楊、蕭主要是楊的節制，論宗教地位及起義功績，雲山不在楊、蕭下，也因同樣事實，不得不退居第三位。領導集團內部的分歧，在建國開始，已顯示分裂的危機，這個危機又是在發展而無法克服的。

太平軍初起，清軍每戰必敗，咸豐乃派首席軍大臣賽尚阿督大軍圍攻永安城。咸豐二年二月，城中糧盡，太平軍突圍，大破清軍，殺四個總兵官，乘勝進攻桂林。在突圍中，洪大全被清軍俘獲，這是巨大的損失。天地會有廣泛的裝束基礎，有二百年的反滿歷史，有自己崇奉的萬雲龍大哥和五祖，有傳統的組織形式和特殊慣習，另一方面，它沒有上帝會那樣統一組織與嚴格紀律，這些，都阻礙了它和上帝會的合作。洪大全在承認太平天國天王是「明太祖後裔」兩個條件下，用天德年號天下大元帥名義與上帝會聯合，地位是對等的。這一聯合形式的發展，不僅天地會可在政治經濟平等的思想基礎上合作，就是北方的捻黨，白蓮教，西北的回民，西南的苗民，也可以同樣聯合，協力行動，這種反滿大聯合，足夠保證革命的勝利。洪大全被俘，天地會失去有力首領，此後天地會員或單獨起義，或改奉上帝加入太平軍，不成爲一個對等聯合的力量。上帝會也從此合併上帝與革命爲一事，不許太平軍中有非上帝教徒。上帝會與各種反滿勢力不能合作，從永安突圍後開始，所以太平軍喪失洪大全，對革命前途有極嚴重的意義。

桂林是廣西反革命的中心地，提督向榮，狀元龍啓瑞率綠營兵，團練固守，不敢出戰。太平軍駕雲梯猛攻，婦女助戰，兒童吶喊助威，但清軍有槍砲，太平軍不能取勝，解圍北上攻克全州。從全州到湖南路上，馮雲山戰死。雲山死後，洪秀全勢更孤弱，大權全歸楊秀清。太平軍進攻長沙，沿路吸收羣衆五六萬，其中挖煤工人數千，另立主營，專開地道攻城。蕭朝貴在長沙城下陣亡，太平軍圍攻兩月不能破，轉攻岳州。十月，克岳州。

咸豐二年二月到十月，太平軍損失三個領導人。當時缺乏戰爭經驗與攻城武器，將士全憑勇敢衝鋒，用血肉換取勝利。清軍不敢對陣作戰，專靠城壘與槍砲，馮蕭都是中砲死的，桂林長沙都是靠槍砲守住的。太平軍痛感軍械的重要，在岳州獲得大量船隻及器械，槍砲，實力大增，改變『欲取湖南爲家』（李秀成自述）的計劃，決心進攻湖北。

十一月，太平軍自岳州水陸兩路並進，十二月，佔領武漢三鎮。咸豐三年正月，太平軍水師有船一萬艘，載糧食軍火財物蔽江東下，陸軍夾兩岸前進，水陸號稱五十萬人。沿路民衆踴躍從軍，聲勢浩大，清軍喪膽，望風崩潰。太平軍連克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水陸號稱一百萬人。二月初八日，攻克南京。

南京的攻克，自然是革命一大勝利，但還不是滿清的致命傷。『此時天王東王尙是計及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爲業』（李秀成自述）這個計劃完全正確。證明後來林鳳祥李開芳率偏師北征，直到天津附近，嚇得咸豐帝『預料到北京快要失陷，詔諭各省巡撫將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宮所在地熱河』（馬恩合著：『亞洲與俄國』引一八五四年二月東方郵電），滿清勢力在北方空虛腐朽可以想

見，如果此時天王東王率主力軍乘大勝餘威，長驅北上，滿清措手不及，除倉皇逃遁，決無他途可走，全國反革命失去滿洲主子，就是最兇惡的會國藩，也無法組織湘軍。可惜洪、楊對這一計劃是動搖的，楊秀清聽信一個湖南老水手，『河南河水小而無楫，敵困不能解救；南京乃是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的話，決計定亂南京。這說明太平軍領導思想上保守主義戰勝了進取主義，安富尊榮觀念戰勝了刻苦戰鬥觀念，總之是機會主義戰勝了革命主義。這個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太平革命失敗的決定因素之一。

太平軍別一大失策是棄地不守。岳州、武漢、九江、安慶等地，全部放棄，滿清官吏很快的恢復統治機構，殘殺革命民衆。如果派兵駐守，援助當地民衆反抗滿清統治，擴大革命佔領地，南京形勢也就會鞏固起來。太平軍不知守地，清欽差大臣向榮率盜魁張國樑自廣西尾隨在後，止隔十天，向榮到達南京城東孝陵衛，成立所謂江南大營。又一滿清大帥琦善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各軍自河南至揚州，成立所謂江北大營。南北兩大營都是些八旗兵綠營兵，不堪一戰，但政治影響對滿清有利。滿清在江浙上海搜括財物，供給兩大營，大批強盜流氓應募入營，兵力愈益強大，盜魁張國樑兇悍善戰，成爲主幹人物，它戰鬥力不及湘軍，但對南京是一個大威脅。

戰略上的失策，要引起嚴重的後果，但太平軍還有極大成功的一面，使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造成堅強的基礎。這就是百萬人民的直接參戰與廣大民衆的擁護革命。太平軍從廣西出發，沿路誅戮妖魔鬼魔（官、幕、吏、役），焚燒衙門，糧冊，田契，借券，殺逐豪紳，地主，和尚，道士——這種人（除地主）多數是土地佔有者或高利貸者。人民驟脫封建剝削的束縛，感受革命所給的愉快是不可以

言語形容的。他們參戰，當然不是所謂好亂。太平天國野史說「沒入財物，必擄達官富紳行之，民間則絲毫無擾也。且每以獲得衣物，散給貧者，並言將來治平，概免租稅三年，鄉民德之。湘楚之民，大有一奚我后，后來其蘇」之概，太平軍至則爭迎之，官軍至則罷市」。這是事實，就是反革命領袖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太平天國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滿清軍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根本不知有所謂紀律。太平軍恰恰相反，普遍保持極嚴格的軍事紀律。李秀成自述說「天王駕入南京，開立軍伍，整立營規。東王佐政事，專責嚴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嚴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斬不赦。法律嚴，故癸丑（咸豐三年）年間，上下戰功利，民心服。」事實上太平軍紀律始終良好，連曾國藩也不敢否認這個事實，太平軍的基礎就建立在這個事實上。

太平軍戰略錯誤的影響就在開始，而革命基礎却已迅速長成，這就是前期飛躍發展的原因。

後期革命形勢——停滯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正式成立國家政權，軍事、外交、政治、經濟都是急待處置的重大問題，太平軍實際領導者楊秀清怎樣來處置這些問題呢？他是「才能極大」，「令嚴軍民畏」的剛強人物，他依據平等原則，建立起嶄新的天國制度，成績是偉大的，但錯誤也不小，使革命陷於停滯甚至

釀成內部大變亂。

軍事問題

要剿滅滿清必須北征，要鞏固南京必須西征，要斷絕滿清財源必須東征，太平軍處置三方面軍事基本上是失敗了。當時南北各地，民衆紛紛起義，對太平軍絕對有利。黃河流域捻軍大起，首領有張洛行、李兆受、李士林、劉疙瘩、劉元吉、任二皮、魏得樹等，張洛行勢力最大；長江以南以至珠江流域，天地會到處發動，陳開起兵廣東佛岡縣，黃威起兵福建廈門，劉麗川起兵上海最爲著名。此外較小事變真是不可勝數。例如湖南，照會國藩說：「去年粵逆入楚，凡入添弟（天地）會者，大半附之而去」（咸豐三年二月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但是他在「移駐衡州摺」裏表示驚慌失措，認爲「若非痛加誅鋤，則禍患將無了日」。他說：

數月之間，四屬匪徒屢次滋擾，如常寧有白沙堡之案，衡山有草市之案，永興有獅子寨之案，安仁有焚燬衙署之案，桂東有縣城失守，賊密把總之案，宜章臨武有廣東匪徒滋擾之案，永明江華有廣西匪徒竄入戕害千總之案。此外四屬中，聚衆倡亂，搶劫拒捕，爲案甚多，未及一一上瀆聖聽。

這樣多的起義，證明在太平革命影響下，人民憎恨滿清已達頂點。會國藩不認爲滿清統治完全破產，却描寫成「皆由上年粵匪經過，永、柳、桂一帶，擾脅取業，或久投偽職，或飽掠潛歸，以致羣民構煽，甘心從逆，動輒貼粵匪之偽示，張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兒偷盜，三五成羣，亦敢倡言謀

亂，毫無忌憚。『事實上太平軍不曾經過的地區，同樣如火如荼在燦發。而太平軍佔領的地區，人民安居樂業，擁護太平軍。曾國藩自己供認：

伏查崇（湖北崇陽）通（通城縣）兩縣向爲匪徒噴聚之區，自正月以來，居民多已蓄髮，樂爲賊用。其旁近州縣，如通山、蒲圻、大冶、興國、咸寧、嘉魚等屬，皆已爲賊所據，官兵到境，無士人爲之嚮導，無米鹽可供買辦，人心之壞，實堪痛恨（咸豐四年三月報崇通剿匪勝仗摺）。

根據上述例證，可以斷定太平軍無論北征、西征、東征都有可能獲得最大的勝利，但太平軍並不能利用這樣優越的形勢。

北征——太平軍克南京，卽派林鳳祥、李開芳、羅大綱率兵攻下鎮江揚州二重鎮。洪楊計議北征，羅大綱主張『欲圖北必先定豫，車駕駐汴，軍乃渡河。若懸軍深入，犯險無後援，臣不敢奉詔。』洪楊不聽大綱這個正確主張，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智謀不足，臨行又受洪楊『師行間道，疾趨燕都，毋貪攻城墮時日』的詔諭。北征軍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咸豐三年四月，破安徽鳳陽城，五月入河南，攻開封，六月，渡河攻懷慶。滿清集合北方軍隊死力防堵，吉文元戰死。七月，棄懷慶攻入山西，沿路血戰，餘衆不過二萬。楊秀清派兵二萬往援。九月北征軍入直隸攻至天津，清軍聯合團練開放河水，田野漫沒。十月，退靜海一帶。北征軍不慣北方冬寒氣候，耳鼻凍裂，手足潰爛，糧食又缺，清軍四面圍攻，兵力大耗損。咸豐四年正月，北征軍放棄靜海，轉至阜城與清軍相持。五月，李開芳率一軍攻入山東高唐州，迎接南

京新來援軍，林鳳祥困守直隸連鎮待援。四月，南京援軍在山東戰敗，林李分散不能會合，勢更孤弱。咸豐五年正月，林鳳祥軍糧盡，士兵餓極，不能舉刀矛，連鎮被清帥僧格林沁攻陷，全軍戰死，無一人求降。清軍全力合圍高唐州，李開芳軍長精練，堅守不屈，四月，清軍決黃河水灌城，李開芳軍全軍淹沒。

北征軍勇敢堅決，血戰兩年，全部戰死，真不愧爲革命戰士，民族英雄，雖然戰敗，連會國藩也驚嘆它的「堅忍不屈」。北方大平原利於馬兵，地近北京，滿清統治比較鞏固，北征軍多是廣西湖南山鄉人不慣北方的氣候，地形，麵食，又不通北方的言語風俗習慣，再加宗教隔閡，難與民衆接近，這些，都是北征軍的劣勢，戰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先在河南停頓一時，聯合河南、安徽、湖北、山東一帶捻軍，既可掩護西征軍保守武漢，又可增加馬步實力，南京援軍也不會沿路被堵，北征勝利的希望還是很大，可惜被楊秀清的錯誤指導所斷送了。

西征——要確保南京，必需確保長江上游武漢、九江、安慶三大據點，關鍵尤在武漢的得失。太平軍與反革命湘軍長期戰爭，實際就是上游三大據點的爭奪戰，最後被反革命戰勝，武漢落入胡林翼手中，會國藩得專力進攻九江、安慶，太平軍從此只能作防禦戰了。咸豐三年，與北征軍出發同時，南京派遺胡以晃、羅大綱、賴漢英、石祥真、韋俊，進兵安徽江西，五月，克安慶，圍南昌。吉安等地民衆起義響應，聲勢大張。清軍危急，會國藩在湖南被迫出湘勇數股來援，一戰潰敗，羅澤南股死傷最大。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退兵攻取九江，吉安等地民軍被湘勇羅澤南等擊滅。四年六月，攻克武昌。會國藩湘軍水陸並進，會合其他清軍死力奪武漢。八月，陷武漢，經幾次大戰，太平軍退出湖

北境。湘軍圍九江，守將蔣啓容善於戰守，屢破湘軍，但形勢對湘軍有利。

西征軍得石達開指揮，在江西境大破湘軍，再度出兵攻武漢，五年正月，連克漢口、漢陽。曾國藩攻九江不下，湘北又告急，他是第一等重視上游的，分全部兵力為四股，令頭等漢奸胡林翼、羅澤南各率陸軍一股，彭玉麟率長江水師一股援救武昌。留塔齊布五千人圍九江。二月，太平軍克武昌。這一次大戰是革命與反革命雙方決死的鬭爭，滿清政府與曾國藩湘軍密切合作，竭盡全力從失敗中求取勝利，太平軍方面却因領導集團內部不和從勝利轉成失敗，這裏必需敘述戰爭指導者楊秀清與軍事指揮者石達開的事跡，說明太平軍失敗是極可痛心的內訌產生必然的惡果。

咸豐三年，胡以是攻開安慶，人民不習慣太平宗教與法制，頗多抗命。一天王命達開赴安慶一帶安民，達開既至安慶，以誠意相要結，擇村里之賢望者為鄉官，緝盜賊，嚴軍法，使各安其業。更督民造糧冊，按畝輸錢米。於鄉里之災暴者抑制之，無告者賑恤之。立權關於大星橋，徵江面商稅。軍用裕而百姓安之，頌聲大起（太平天國時史）。這是最基本的建設，可是不滿三個月「東王楊秀清忌之，以燕王秦日綱代達開，命還京襄理朝政」。

等到咸豐四年七月，曾國藩湘軍大舉攻破岳州進攻武漢，才再派達開率兵往救。到蕪湖，湘軍已奪取武漢，入江西省攻九江了。達開守安慶，出兵援九江，大破曾國藩軍，又大破羅澤南軍。湘軍陸軍受挫，水師仍在江上猖獗，十二月，水師主力駛入鄱陽湖，達開築壘斷水師後路（湘軍水師因此分為外江內湖兩部），命胡以是羅大綱率小艇襲破曾營，奪得曾國藩座船，國藩駭極投水尋死，被附近小船撈起，倉皇逃入羅澤南營。這個漢奸頭子四月裏在靖港曾投水尋死一次，回到長沙整頓了一番湘

軍，這一次又大敗，死，確是悲觀失望到極點。在羅澤南營寫遺疏千餘字，準備再尋死。羅澤南竭力苦勸。說是一天若不亡本朝，此老必不死，果然，他又幹起漢奸勾當了。遂開乘勝進克武昌，六年攻南昌，湘軍撤九江圍兵，數萬人援南昌，遂開兵才數千，自率敢死士夜襲樟樹嶺湘軍大營，湘軍最怕遂開，不戰潰逃；遂開率騎兵數十人猛追，湘軍全軍大奔不能止，曾國藩逃入南昌城困守。江西八府五十餘縣都入太平軍手中。

咸豐五年正月，石達開進攻武漢，二月，克武昌。曾國藩深知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為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為恢復之計（與胡林翼書），出四分之三兵力與西征軍爭武漢。江西湖北兩省大戰開始，湘軍敗多勝少，大將羅澤南塔齊布相繼斃命，曾國藩在南昌危城中，內外隔絕，「凡江楚文報自賊中經過，輒被殺害，臣等屢募長髮探卒，禮丸細字，作為隱語，以通消息」（五月陳明鄂省援兵協餉片）。他驚駭到「道途夢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魄屢驚」，已成聽中繁的形勢。他是被當時漢奸輩奉為唯一領袖的。羅澤南所謂「但留曾公一人在，其他均不足計」的，南昌如果攻下，國藩就擒，等於滿清政府和漢奸幫失去靈魂。正在兩軍肉搏最緊張的時候，七月，楊韋內江勃發，石達開聞變，急自湖北洪山馳回南京，被洪秀全解除兵權。遂開畏禍率部自由行動，從此太平天國轉入衰亡階段，無力再爭上游。十一月，湘軍攻陷武昌，大舉進攻九江城。

石達開是曾國藩最怕的敵人，說「逆首石達開，發悍為諸賊之冠」（咸豐八年陳明石逆情形片）。咸豐帝聽說楊韋內江，喜歡得大發幻想，命曾國藩準備達開來降，說「倘向曾國藩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亦當預為籌畫」（十月二十日上諭）。反革命對他畏懼

重視如此，洪秀全却自壞長城，迫他逃出南京。北征軍因孤軍失援，放走了咸豐帝，西征軍又因內部衝突放走了曾國藩，兩次失機，革命頹勢很難挽救了。

東征——江南江北兩大營威脅南京，太平軍留大部份精銳守城，兵力不能出鎮江以東。江浙地方富庶，從財源上，正如曾國藩所稱「克一城有一城之利，拓一里取一里之財，究竟遠勝於他省」（同治元年近日軍情片）；從軍事說，南北大營招募兵丁費，北京政府官員旗人生活費，主要依靠江浙上海三處供給，正如胡林翼所說，「江浙爲倉庾根本，京師性命所繫」。東征江浙，正是破壞南北大營援助北征軍，削弱北京政府的必要處置，洪楊在這方面完全不加考慮，是最大失策之一。

太平軍攻克南京，人們都預料上海一定是攻擊的目標。英領事組織義勇團保護租界，清官吏要求各國干涉，保護上海城，被各國拒絕，束手無策。當時上海有廣東人八萬，福建人五萬，鄰同情太平軍，準備起義響應。咸豐三年九月，廣東乙首黨（天地會的一派）首領劉麗川聯合福建青巾黨首領陳亞林及江西綢鏡會共二千餘人，從北門攻入知縣衙門，佔領上海城。這次起義止殺死一個知縣官，傷一個北門守門人，秩序非常良好。粵閩贛同鄉及上海人寧波人整千的加入，勢力大增。他們用「大明太平天國」名義出佈告，一律蓄長髮，但不奉上帝教。他們在美國教士家中發現馮雲山的幼子，立即歡迎入城，花五百銀元買一匹好馬讓他騎上，在城內遊街，很熱鬧高興，這就是天地會對太平天國的態度，他們派代表到南京接洽，洪楊認乙首黨是天地會的支派，有「腐敗之習慣，放恣之癖性」，拒絕合作。起義軍與清軍三萬人交戰，不怕大砲轟城，也不怕開地道進攻，屢次殺敗清軍，不少清軍自動降到起義軍方面來。咸豐四年十二月，法國水師提督及領事聯合清軍攻城，法艦發砲擊毀東北角城

艦，法軍二百五十人率大隊清軍登城，起義軍奮勇抵抗，殺死法軍十三人，擊傷五六十人，清軍死一千二百人，傷一千人。法軍逃走，清軍還留在城上，上海幫首領小鏡子（即潘可祥）率一二百人以上城搏鬥，全隊大聲呼喊。『清軍開聲，心驚膽破，急忙奔逃，出城門也來不及了，即從城上跳下，其時天寒冰結，清軍許多跌死城下，有些跌在長矛之上，有些斷腿折骨，傷者皆被抬回清營。清軍既逃回本營，黨人復關閉城門』（雅芝教士太平軍紀事）。清軍得租界援助，圍困上海城十七個月，咸豐五年五月，起義軍糧食斷絕，終於放棄縣城，突圍逃走。如果太平軍不因宗教偏見，派兵援救起義軍，確實佔領上海，外交上（當時英美聲稱守中立）財政上都有極大的便宜，滿清後來也不能組織淮軍常勝軍。戰局可能發生另一面貌。

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勝上海起義軍，五年正月，進攻鎮江，江南大營向榮加緊圍困南京，太平天國形勢危急。楊秀清派遺李秀成、陳玉成等往救鎮江，大破江蘇軍，殺吉爾杭阿。六年三月，秀成渡江擊破江北大營。秀清又命李秀成、陳玉成等，攻向榮大營，五月，李、陳軍從西面，鎮江軍從東面夾攻，恰巧石達開率兵來援，三面奮擊，大破向軍。張國樸扶向榮（七月向榮死，和春代爲欽差大臣）突圍逃往丹陽。三四年來圍困南京的江南大營一戰瓦解，楊秀清見外敵已去，開始在南京發動內亂。

軍事是革命的骨幹，太平軍將領和士兵都是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可是在錯誤指導下，雖然戰爭中獲得不少勝利，到底不能得到應得的果實，革命發展陷於停滯了。

外交問題

上海是英美法三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它們不願中國有新的變動，尤其不願上海有新變動。咸豐三年四月，英公使卜亨給太平天國信裏說「總之中國既准五口通商，則無論何人，有損我商務者，我國惟以兵戎從事」，這就是各國對太平天國的一般態度。

當時滿清政府大施卑污賣國手段，要求外國援助。一面宣稱租界西人都贊成清政府，歐洲兵船十餘艘，準備協助剿匪，進攻南京，一面劃上海內外城廂地，請各國海軍保護。各國拒絕不允。清政府被窮，乃偽造太平軍排外告示，威嚇外人。英香港總督邦漢親到南京訪問太平首領，天王接見邦漢，自稱爲教主，稱英國爲藩屬，英王爲藩臣，邦漢很不愉快的回去，滿清卑污手段算是成功了。

太平天國方面，不懂得國際情勢與外交手腕，一時錯用民族自尊心，那是不足怪的。外國侵略者反對太平天國，主要不在洪秀全的傲慢態度，而在他的正確主張！就是國際地位平等（中外是兄弟之國，要共同生活如弟兄），貿易完全自由，但嚴禁鴉片輸入。其次是「將來外國人可以隨便用汽船鐵路電線及其他西洋機器而無礙」（太平軍紀事）。當時侵略者自稱「文明傳播者」，把中國人當作野蠻人對待，而國際貿易情況，舉一八五五年爲例，上海輸入總額達一百六十萬鎊（現金和鴉片不在內），其中英國佔一百一十二萬鎊，美國佔二十七萬鎊，其他國家佔二十萬鎊，上海輸出總額則達一千二百六十萬鎊，其中英國佔六百四十萬鎊，美國佔五百二十九萬鎊，其他國家佔十萬鎊，這樣巨大的輸出超額，完全靠鴉片輸入來抵補。一八五六年，輸入中國的鴉片約值三千五百萬元，英、印政府在

這一年內，收入二千五百萬元，佔國家收入總額的六分之一（一八五三年佔七分之一）。嚴禁鴉片，等於致英、印政府於死命，這是英國爲首的侵略者反對天國的基本原因。其次，天國允許將來外國人可在中國辦新式交通和工業，那時候資本主義還沒有到帝國主義階段，不能向國外輸出資本，事實上等於天國有在將來自辦新式交通和工業的意志。英國會議員斯頓卜萊登對選舉人演說「假使中國成爲一個大工業國，那我就不知道，歐洲從事工業的居民如果不將自己降到自己競爭人的地位，如何能够經受得住和這些競爭人的鬭爭」（資本論引）。他們深怕「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的中國人」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反對天國的第二個原因。所以英美法雖然宣佈局外中立，是對蓬勃發展的太平革命勢力有所顧忌，並非善意的真正中立。太平天國考慮禁煙問題，不願引起外國衝突，採取消極政策，停止向江浙作軍事行動（賴文光「供辭」說明這種政策確是畏避外國侵略者）。其實乘革命漲潮，奪取上海，與英國訂約逐年減少鴉片輸入量，英國爲保持絲茶貿易（產地在天國境）及發展市面貿易（英國特產），衝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政治思想與宗教問題

洪秀全倡導的太平革命運動，是中國廣大窮苦人民反官紳地主富商高利貸一切封建剝削制度的產物，同時它又是英國大砲的產物，這就是說，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與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有極地聯繫着。秀全生長在國際市場的廣東，通過基督教接受了某些資本主義思想影響，與人民反封建剝削的實踐要求結合起來，再加上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與周禮制度，形成一套特殊的上帝教義，其中包

含着的民主內容，主觀上有共產主義的空想，客觀上正是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反映。它以平等自由爲主旨，創造新宗教，再由宗教發動武力，借武力攻下反動的堡壘。

宗 教

洪秀全的上帝是平等自由博愛的上帝（楊韋內訌以後，上帝變樣了），是戰鬪誅妖的上帝，總之是一個革命的上帝。恩格斯說：『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鬪爭，在當時（歐洲資產階級開始革命時代）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對教會』（天主教會）。上帝教正是這樣的宗教，它不要在中國有六七千教徒的天主教做朋友，却要在一千四百教徒的基督教做兄弟，這不是偶然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權力集中的天主教會，而有散漫繁雜的菩薩、神仙、孔子、儒先以及無數牛鬼蛇神，替封建統治者服務。洪秀全把『正』的方面集中出一個『皇上帝』，『邪』的方面集中出一個『閻羅妖』，鬪爭營壘劃分得很清楚。他開始傳教，一個地方紳士勸說：『中國人皆拜偶像的，讓他們自由拜神罷』，這個統治階級的所謂『自由』，被他拒絕了，他把自己書塾裏的孔子牌位拋棄，又打毀威風極大的甘王爺神像，上帝教徒受他的感化，從舊神權中解放出來，敢於向人間社會要求信仰自由。當桂平縣官更派兵捉拿洪秀全，馮雲山時，教徒大呼：『我們要拜什麼神，是不能受人號令的』（太平軍紀事），金田起義後，清兵屠殺新墟，教徒直立受刑不肯下跪，對清兵大呼：『爲何遲遲不動手，要殺便殺罷，我是不怕死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這是多麼英勇的戰鬪精神呵！

救世、醒世、覺世三篇是上帝教根本教義，要求在上帝統率下，國與國平等，人與人平等，男與

女子等，富與貧平等，反對私，反對妖，反對不正，反對壓迫，充滿着對閻羅妖戰鬪的勇氣。此後天國制度都從三篇教義出發，成爲太平革命運動的最高原則。

上帝教包含宗教迷信與革命思想兩部份，在廣西，迷信部份會起了極大的組織作用，但從全國範圍說來，一般人保守拜鬼神尤其拜祖先的習慣，不能輕易放棄，外國神耶穌更不合鴉片戰後全國反侵略的心理。太平軍入湖南境，如果參照禹大洪告示的方法，強調反滿革命理論，少提天父天兄耶教一類迷信，號召力定會增大無數倍。可是太平軍不懂得一出廣西，宗教部份必需放鬆的道理，自湖南到南京途中用東王西王名義，發布『奉天討胡』、『奉天誅妖』、『諭救世人』三道檄文，後兩道勸人丟邪神，拜上帝，信奉上帝教，前一道申明民族大義，披髮革命義憤，文字極強健有力，但至少被前兩道折扣一半。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不論左宗棠果有其事與否，反滿不反孔，確代表一部份士人的思想，這種人既不像官僚那樣腐朽無能，又有能力去欺騙落後民衆，是當時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曾國藩『討粵匪檄』特別強調『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斬約之書』，又說『粵匪糜鄧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折兩廡，狼藉滿地，所過州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漂源，亦污其宮室，殘其身首』。這一宣傳，曾國藩勝利了。湘軍的領導骨幹是士人，借『衛道』名義掩護漢奸的實質，如果太平軍對士人有正確政策，可以削弱湘軍的一部份實力。

太平軍出廣西境，落後的人民對完全陌生的上帝教，自然會看作外國教，接受曾國藩『窺外表

之緒，崇天主之教，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的惡宣傳。太平軍在信仰方法，應改「打倒一切偶像」爲「打倒菩薩、神仙、淫祠」，不必毀孔子關岳廟，更不必強迫人民專拜上帝，理論方面應發展儒書中進步學說（救世醒世兩篇就是這樣做的），與平等思想結合，不必把儒經當作「妖書」。這是革命的讓步，也是對反革命的進攻，止有這樣，才能減輕社會的阻力。打擊會國藩一類人的陰謀。但後來洪楊愈更偏重發展迷信部份，尤其是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遂行私意，僭妄自大，造成「宗教腐化」（太平軍紀事評語）及洪楊衝突的惡果，發動革命的工具有轉化爲破壞革命的毒素，宗教這個火不是好玩的呵。

私有財產

咸豐三年，太平天國在南京刊布『天朝田畝制度』，這是天國政治經濟的基本思想。文件中有下列一段話：

凡天下田，男女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能暖也。

根據這個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在土地問題上產生分田法，根本推翻地主佔有土地制。

分田云者，凡田分九等，共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爲上上田，可出一千一百斤爲上中田，以下遞減至四百斤則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各按家口之多寡（不論男

女)以行分田。凡男婦每一人自十六歲以上，受田多踰十五歲以下者一半。如十六歲以上分上上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半，分上上田五分。一家六人，則分三人好田，分三人饒田，好饒各半。

這個分田法規定得如此詳盡細密，就不得不陷於空想。據現有各種史料看來，它似乎未曾實行過。不會實行的原因，首先是土地與人口的配合，情形非常複雜，不像思想那樣容易，其次是滿清軍隊不斷進攻，燒殺搶掠，天國領土常起變動，農村秩序無法安定。但從另一意義看，也可以說實行了，因為地主高利貸者或死或逃，土地歸耕者所有，地主剝削已不存在；滿清地方政權摧毀，曾國藩「備陳民間疾苦疏」所舉三條也不存在，農民有田可耕，無各種剝削，僅對天國政權繳納輕微的糧米（令利太平天國外記說：賦稅極輕，農田視土地之肥瘠，分九等課稅）。照曾國藩（同治二年）說：「民間耕種，與賦各分其半」，照楊秀清奏：「曉諭良民，照舊交糶納稅」；照李秀成自述：「蘇州百姓應納糶稅並未收足，田畝亦是聽其透納，並不深追」，照林彩新勸諭青浦民衆徵文（同治元年）：「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贖捐糶」，依據這些材料，太平軍取之於民的主要是米糧，銀錢非急需，並不徵收地丁（現存浙江仁和縣，太平十三年便民山單可證）。所謂照舊捐糶，如果照滿清漕米舊規（據曾國藩所說），「錢糧之重甲於天下」的江南田，每畝正額不過二斗內外，即使加上「漕斛」，「幫營」，總數也不過六斗，佔每畝產量（一石六斗至二石）中三分之一左右（滿清錢糧太重，不在額數而在米變錢，錢變銀及其他折色、浮收、訛詐、刑追等惡弊），並非「公私各半」。天國農民生活與滿清統治時期對照，顯然有天淵之別，這就給「最純粹的、最澈底的、完滿到合於理想的資本主義」

造成最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太平革命的偉大成就在此。曾國藩爲首的一羣賊匪「痞棍」的理由也在於此。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實際上只是要求廢除封建私有財產）原則下，又產生聖庫（藏銀錢）聖糧（藏米糧）制度。太平軍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領俸錢，只是食肉有區別，天王每日給肉十斤，以次遞減，至總制（等於滿清知府官）每日半斤，總制以下不給肉。每逢禮拜日，各官開單赴聖庫聖糧領禮拜錢、糧、米、油、鹽及祭上帝物品。兩司馬（管轄二十五人的小軍官）每人每日給錢一百文，普通兵士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給米二百斤，油鹽各七斤。另外有買菜錢，下級軍官可向上級請求，錢數不等。買豬雞等供業兵會餐。原則上天王到士兵不准私蓄財產，衣食器物一切生活費用（包括醫藥、殘廢院、老人館）全由公家供給，實際是個別高級領導者積蓄不少私物，極大多數官員及士兵始終保持嚴格紀律，表現高度的革命純潔性。例如維多利亞主教稱太平軍紀律「較清教徒尤爲嚴正」，反對太平天國的卜羅斯在致魯萊爾信裏，不能不承認「寧波已爲亂軍所據，城內尚無殺戮之事，生命財產之損失極少，亂軍秩序奇嚴」這個事實。

在廢除私有財產制原則下，又產生近於工業國有的諸匠營制度。太平軍領土內，集中各種工人，按技術分別設立諸匠營。照「賊情彙纂」所載，有木匠、金匠、織匠、金靴、繡錦、鐫刻等營，這種匠營掌管生產物品，不兼管收發。又有各種典官，如典紅粉，主製造火藥；典硝，主煎熬硝磺；典鐵，主製造兵器鐵器；典銅，主製造銅器。典官製造兼收發，與諸營匠同爲管理生產的機關。這個制度已近於手工工場性質，比手工業提高一步。據「賊情彙纂」的批評，稱爲「各儲其材，各利其器，

凡有所需，無不如意」，是見生產效率是優良的，如果繼續前進，可以順利地轉到機器工業階段。

廢除私有財產的理想，在實行時表現爲攤費地主階級，耕者有其田官員兵士生活共產化，工業國營三種形式，基本上是成功的。後面兩種所以成功，由於前一種的成功，前一種所以成功，由於太平軍領導者的實際行動不是硬照教義的空想，而是照顧到農民商人（主要是農民）的客觀要求。天朝田畝制度規定：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到歸國庫。凡麥豆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帝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

張錫庚《難民陳述賊情記》載下列詞句與太平軍告示。「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口歲給一石，小口歲給五斗」，語意符合。

不要錢漕，但有姓之田，終年所得粒米全行歸天王收去。每年每大口給米一石，小口減半，以作養身。舖店本利，亦歸天主，不許百姓使用。

這自然是不能實行的辦法，定都南京不久，修改政策，對農民採取徵收漕米，對商人採取自由貿易，天國軍事政治才獲得經濟基礎，農村因之組織起來，金融因之活動起來。

天國領土內採取古代寓兵於農的組織法，普遍建立守土鄉官制。鄉官編制與軍隊同，平時管理民政（徵糧、工程、教育、訴訟、保舉），有事每家出一人當兵，卽成鄉軍，鄉官卽成軍官。編制法全照周禮，就是五家爲伍，設伍長一人；五伍爲兩，設兩司馬一人；四兩爲率，設率長一人；五率爲

旅，設旅帥一人；五旅爲師，設師帥一人；五師爲軍，設軍帥一人。每鄉共一萬二千五百家，成軍得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軍帥以下各鄉官，全由人民公舉，「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天朝田畝制度）。這雖然止是有限的民主權利，但在統治階級看來，已是恐慌失色，『賊情案纂』說『賊之牢籠人士，聯絡方域，計畫無議於此者』。換句話說，就是專制統治最怕民主政治。天國人民已經獲得初步的選舉鄉官權、地方自治權，不僅從古所無，直到今天將近百年，雖然陝甘寧邊區及徽後解放區已經實行了比這完備多倍的民主政治，但許多地方，人民還不會取回這些權利。

太平軍對國際、國內貿易，採取自由政策，抽稅極輕。『以船長一丈，抽稅千錢，所載之貨，分粗細貨，粗貨船長一丈，抽稅錢二千，細貨倍之。大率以鹽布棉花煤米爲粗貨，絲綢蘇貨爲細貨。抽稅之後，給以船票一張，如遇他軍，可以驗票放行，無票則沒收之。』（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外紀比較滿清與天國兩方商務，得出如下的觀感：

余自仙女廟（江蘇江都縣屬）購米後，回南京，途中遇燈卡甚多。每二三里即有一所，草屋上懸抽釐助餉字樣。自仙女廟至瓜州（南京對岸儀徵縣屬）燈卡二十處。所定之稅，視法定額增加數倍，任意剝削，小民控訴無門。

太平軍於各處所設之稅局，其組織極公平正確而簡單。每鎮每村僅一所（大概是指鄉官所管國庫），貨物已納稅者，給與憑照，不再於他處科斂。絲業之所以發達，未始不由於稅法之良善也。歐人之至南京貿易者皆能言之。

太平天國稅法良好，境內平安（一八六〇年，容闈帶現銀四萬兩，在天國太平縣買茶葉二十八船回上海），農民購買力增強，自然促進商業的發展。英教士洛勃斯克給香港日報通信說「南京城外，商務發達，秩序安謐，城內居民則衣食豐足，安居樂業」。這種繁榮情況，外國商人應該也是歡迎的，事實却相反，因為他們是侵略者，愈引起對天國的憎惡，試看下列輸出入表。

絲茶輸出（茶單位十萬鎊）（絲單位千包）

	茶	
	上海	福州
一八五一年		二〇
一八五二年	六〇〇	
一八五三年		四一
一八五四年	五〇〇	
一八五五年	八〇二	一五七
一八五六年	五九三	四一〇
一八五七年	四一〇	三二〇
一八五八年	五一〇	二八〇
一八五九年	三九〇	四六五
一八六〇年	五三五	四〇〇
		六九

上海出口的茶，大部份產地在天國境內，絲也佔不小部份。絲茶輸出總額一般是比起義前增長，英國來抵補的鴉片同樣增長起來。

鴉片輸入（單位百箱）

一八五三年	二四二
一八五七年	三一九
一八五八年	三三〇
一八五九年	三三七（另有二千六百箱不經上海，直輸寧波）
一八六〇年	二八四（李秀成攻入江浙）

太平軍絕對禁止鴉片（可能少數偷運入境），而英國及必需採購一部份江西安徽茶（一部份在福建廣東採購），不得不忍痛用現銀購買。上海道吳健新記咸豐三年英兵船訪問南京情況說「英船至鎮江，賊自用旗招往過船相見，云：如有大砲火藥米糧可來銷售。英夷告以此等貨物如賣與你等，有違中國和好，如要煙土，儘有可賣。答云：我處不用此物。」英國侵略者開始就憎惡太平軍，因為它是鴉片的仇敵。滿清政府取相反的方向，一面儘量歡迎鴉片，一面向侵略者搖尾求援。例如咸豐三年署兩江總督楊文定致英美兩國公使照會說：

爲借船助剿以安商民而全永好事：竊自賊匪據船東下，連陷江寧鎮江……欽差大臣向崇亦以須借貴國火輪兵船爲望……希念兩國通商合好已久，今商民被擾，貿易不通，且賊匪煙禁甚嚴，一遇我國吸煙之人，無不被殺。統希速發火輪兵船，來江剿擊，本署部堂欲爲商民除害，斷不大

言欺人。倘蒙允發火輪兵船前來洗滌賊匪，必當奏明皇上，加重酬勞，而貴國借兵恤鄰之聲名，亦永傳不朽矣。

楊文定無恥到借太平軍嚴禁鴉片作爲理由來恐嚇，利誘英美，充分暴露出統治階級的卑污賣國心理。曾國藩以及後來的那些獨夫民賊，思想上完全是楊文定的繼續。

太平天國在土地政策上的成就，使外國侵略者與封建統治者山崩地裂而離合。太平軍因領導集團內訌，使反革命有機會來摧毀這個成就，中國社會從此停滯了一百年。

婦女與婚姻

太平軍根據平等自由的原則，作了偉大的婦女解放運動。恩格斯說「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傅立葉是說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我們可以說，太平軍是實行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太平軍看婦女是姊妹而不是奴隸，因此與看作兄弟的男子一切平等。在婚姻上，「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天朝田畝制度）。在經濟上，「各按家口之多寡以行分用，不論男女」（同上）。在政治地位上，女官與男官同等，最高官職是女軍師政副，又正副四人（楊秀清是男正軍師），開科取士，男女同有應試權。在軍事上，有女軍四十軍（每軍二千五百人），「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永安城突圍詔）。在生產上，設立女館，學習工藝。在軍律上，「凡強姦經婦人喊冤，定即斬首示衆，婦女釋放。如係和姦，男女皆斬」。其他如禁纏足，禁買賣奴婢，禁娼妓，禁人民蓄妾，所有惡俗，悉數剷除。這樣澈底的婦女解放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世界歷史上不會有第二

個，真是人類最光榮最先進的行動。曾國藩號召「扶持名教，敦叙人倫」（討粵匪檄），就是要驅迫婦女回到奴隸圈裏去生活。

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婦女的卑弱姿態，英人吳士禮在「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裏說：「此處（南京）與全國吾所會遊之其他城市大異之點，即是婦女隨便遊行或乘馬於通衢大道，而又絕不裝模做樣害怕外國人如其他中國婦女所常爲者，亦不迴避我們」。從纏足羞怯到大街騎馬，不避男人，無疑是解放運動的效果，吳士禮却譏諷爲太平軍擄掠美女供淫亂，侵略者仇視進步，本無足怪。可惜太平軍領導集團中人多數納妾，洪楊尤縱慾腐化。吳士禮說「他們每藉神聖下凡的啓示以爲作惡行淫的護符，甚且藉以廢除第十誡」，這是事實。楊韋二人爭奪美色，竟成爲內訌的原因之一，不免給解放運動留下一個污點。

太平天國在政治經濟方面一般是成功的，外交方面避免衝突，取得英美法形式上的中立，還不算大失策，軍事方面戰略指導錯誤，失去搗毀滿清中央政權的機會，雖然石達開在上海仍能保持進攻形勢，擴大革命領土，但已屬保護南京性質，無力窺取北京了。從全局說來，定都南京到楊韋內訌是革命停滯時期。

三、太平革命衰敗時期

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

本時期可分前後兩期。前期從一八五六年楊韋內訌至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八月安慶失

守，革命勢力處在防禦地位，曾國藩逐步進逼，戰爭爲了打破合圍形勢。後期從安慶失守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六月南京陷落，革命勢力處在被圍困地位，反革命合圍成功，戰爭爲了解圍，自然解圍是不可能的，太平革命終於失敗了。

前期革命形勢——防禦

永安封王以後，楊秀清專擅領導權，洪秀全退居閒散，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向榮「幾次詢訪難民口述賊情片」裏說「臣等於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實無其人，聞已於湖南爲官兵擊斃，或云病死，現在雞一木偶，飾以衣冠，秘置僞天王府內，楊逆七日一朝，其餘受僞職者皆不能見」。雖說是謠傳，洪秀全止是名義上領袖，可以想見。秀清上逼秀全，下壓羣石，彼此猜忌怨恨，繼續增長。咸豐六年七八月間，向榮已敗逃，南京城圍暫解，秀清「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他選擇這個時機，顯然顧慮到內亂並鎮壓內亂，免外敵乘機攻城。北翼二王也密謀「殺東王一人，殺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殺」（李秀成自述）。章昌輝是豪紳地主富商出身，野心極大，自成一個次於楊黨的所謂草黨。秀全密令呂輝圍楊，呂輝從江西急速入京殺秀清及楊黨（當然不全是秀清私人）數千人。這開在湖北洪山，「知道京城殺害許多之人，狼狽趕回，計及免殺之事。不意北王頓起他心，又要將翼王殺害。翼王走上安省。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不分清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勢逼太重。各衆內外，並合朝同心，將北王殺之，人心乃定。後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

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洪仁發）福（洪仁達）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此人又無才情，又無算計，一味固執，認實天情，與我夫王一般之意見不差，壓制翼王。逼翼王他逃。『這是李秀成所說當時實情。最爲可信。從這裏可知大量革命戰士在楊黨，革黨罪名下被冤殺，損失是不可數計的。洪秀全違反衆意，逼走石達開，他是唯一勝任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物，如果天王親理朝政，任達開爲輔佐，局面可能比秀清專政時期好轉，秀全這一謬誤處置，損失也是不可補償的。達開走後，秀全依然過着腐化生活，隱居深宮，朝政委託衆人厭惡的張得恩（髮臣），洪仁發，洪仁達（二洪是天王胞兄）三人掌管。後來又加入洪仁政，洪仁玕（二洪是天王堂兄弟）二人。這些人都是貪鄙醜態，專做惡事的破壞者，弄得『人心敗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各有散意』（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陳玉成爲首的革命力量在戰場上支持，天國早就覆亡了。太平軍一壞於楊秀清的專橫跋扈，再壞於韋昌輝的瘋狂屠殺，最後壞於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是最後一壞，歷時較久。禍國的軍令政令迫使太平軍逐步削弱以至於潰滅。

石達開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洪氏集團和他決裂，並不等於太平軍和他決裂，不該脫離革命營壘，獨立行動，企圖自己創業。他的錯誤行動，終於覆軍喪身，太平軍也勢孤敗滅，個人英雄主義害了他，又害了太平軍。

韋昌輝殺達開一家人，達開在安慶調湖北洪山軍到安徽寧國，準備報仇。秀全借東楊餘黨力殺昌輝，召達開入京，用『留京輔弼』名義，解除達開兵權。東楊餘黨謀大殺革黨，幸得陳玉成反對，說『太平軍皆東北二王舊部，如欲株連，非殺盡太平軍不可』。但楊韋兩黨結成深仇，人人自危。當時

守武昌城主將正是呂孫的兄弟章俊，他是太平軍驍將之一，如果城外洪山援軍不撤退，楊韋餘黨不互仇，武昌可以堅守不失。洪氏集團既不派遣新援軍，又不安守城軍心。十一月，章俊因糧盡退出武昌（咸豐九年，章俊投降湘軍）。太平軍從此喪失上游重鎮，無力再圖恢復。遂聞受洪氏排斥，危疑不安，又感到大勢已去，南京難保，咸豐七年五月，約集將士十餘萬人往安慶，與太平軍分裂自成一軍。

正當太平軍內部分裂的時候，反革命陣營也引起了頗深的裂痕。原來咸豐帝並不信任這個漢奸頭子——曾國藩，相反，對他和他的湘軍懷着極大的猜忌心。咸豐帝聽到楊韋內訌，非常快意，十月二十日上諭作出兩種估計，一是「該逆（石達開）於諸賊之中，最爲兇悍，若令回竄江西，占踞數郡，煽惑羣民，其勢愈難收拾」，二是「該逆備向曾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法，或使先自立功贖罪，再邀重賞」。他着重第二估計，怕曾國藩貪功殺降，預先把它指出。對曾國藩却加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即不遽加該侍郎等以貽誤之罪，該侍郎等何顏對江西士民耶」的訓斥，準備成功以後，免得曾國藩及湘軍將領持功要挾。咸豐帝一貫採取這樣的態度，從來不給他軍，政實權。曾國藩在歷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摺（咸豐七年六月）裏訴苦說「臣未奉有統兵之旨，歷年在外，不敢奏調滿漢各營官兵，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又說「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爲客，視本管上司爲主，賓主既已曖視，呼應斷難靈通」。這些「艱難」還不算，再加上中央政權的一部「和他作難。他說：「部頒緊要之件，亦不徑交臣營，四年所請部照，因久稽而重請，六年所請實官執照，至今尙無交到確耗。此外文員之憑，武官之簡，皆由督撫轉交臣營，常遲久而不到」。部不承認他是正式統兵大員，因爲他「未奉有統兵之旨」，咸豐帝連差遣他作

軍事行動，總是避免『明降諭旨』，正用『廷寄』（軍機大臣轉達）的形式。曾國藩受盡了皇帝、部、地方官的明氣，還要受各方面的暗氣，他說『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師，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摺奏事。迄今歲月太久，國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爲僞造，釀成事端』。但是曾國藩堅決做反革命，不論遭受多少明氣暗氣，總抱定『但首藉數，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他上了這個訴苦奏摺，原想滿洲主子給他一些實權，不料咸豐帝毫不體恤，竟奪去他的湘軍統率權，下諭『准其開去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曾國藩大出意外，再上一個奏摺表示『軍勢未定，寸心難安』。咸豐又給他硃批說『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體廬，仍應候旨』。這說明咸豐帝猜忌曾國藩不亞於洪天王疑忌石翼王，部和地方官侮辱曾國藩，超過洪氏集團壓抑石翼王，湘軍擁護曾國藩，不及太平軍悅服石翼王，曾國藩處境實際上不比石翼王好些。反革命內部矛盾與革命內部矛盾互爲因果，如果翼王能善處逆境，忍受侮辱，竭力保持內部和平，必然等到反革命矛盾擴大，湘軍被綠營兵壓倒的機會。曾國藩在甯閣住一年，因石軍攻入浙江省常山開化，援浙湘軍將領不服調遣，咸豐帝恐慌，給他辦理浙江軍務名義，去『挽救東南大局』。他『奉命即行』，又掌握了湘軍統率權，而石翼王却成爲無根基的孤軍了。

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轉入江西，攻取許多縣。當時情形是『擊獲賊中僞文，均稱石達開諭令諸賊謹守江西。凡江西境內之賊概未調赴下游，而下游之賊反由景德鎮以赴援撫（撫州）建（建昌）』。蓋安慶爲石逆衝踏之巢穴，江西爲石逆新陷之土地。聖旨所謂石逆糾合黨羽，自圖占踞，已可概見（咸豐六年十一月江西近日軍情據實奏摺）。照曾國藩的估計是『以大局言之，北岸安慶，

南岸九江，該逆之所必爭也，以江西言之，瑞州臨江爲根本，撫州吉安爲膏腴，亦該逆之所不肯輕棄也。如果達開真像曾國藩所料那樣做，據安徽江西兩省，與陳玉成李秀成遙相應援，夾擊湘軍，不僅九江安慶可以堅守，陳玉成不會失援敗死，楊卓餘黨投降清軍可能減少，而且那時候捻軍已與太平軍合作，戰爭擴展到中原地區，革命反革命的決鬥，勝敗還是未可知的。石達開不願皖贛有民衆擁護的有利條件，却決心遠征四川，自立一國。路線錯了，雖然擁數十萬大軍，轉戰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西、廣東、貴州、湖北、四川九省，歷時七年，表現革命軍隊的高度堅韌性，到底不免一敗塗地（同治二年在四川大渡河戰死）。狡猾的曾國藩，看出達開已不是大敵，咸豐九年，定四路進兵策，一意取安慶、南京，把達開軍當作「流賊」，放到第二等地位上去。

石達開走錯了路，太平革命軍不得不加在李秀成、陳玉成二人肩上。陳李都是天才的軍事家，陳保衛安慶，縱橫上游皖鄂兩省，與曾國藩湘軍，胡林翼粵軍，勝保北軍相持數年，曾胡竭全力抵抗，饒偉獲勝，陳敗安慶失陷。李保衛南京，克復下游江浙兩省，與曾國藩湘軍，左宗棠湘軍，李鴻章淮軍，戈登常勝軍，英法侵略軍力戰數年，勝敗略等，李敗南京不守。陳李失敗，主要由於洪氏集團從中破壞與石達開不願配合作戰，第二原因才是外國侵略者直接幫助滿清，共同鎮壓太平軍。

本期戰爭以陳玉成安慶保衛戰爲主，李秀成東征軍爲輔，戰爭目的在打破反革命軍進攻南京。

陳李聯合作戰

楊韋兩黨互殺，再加石達開帶走將士十餘萬人，太平軍實力大耗損。陳玉成勇猛有戰功，又是洪

仁珩的姪婿，李秀成新招張洛行鹿得樹所部總軍，號稱五十萬，兵力最火，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李來支持局面，但並不真心信任。

咸豐七年九月，和春張國樑陷鎮江。八年三月，和張進至雨花台，又建立江南大營，與德興阿的江北大營隔江呼應，掘長溝，圍南京城。四月，九江被湘軍李續賓部攻陷，守將林啓容率軍一萬七千餘人戰死，無一人求降。這時候南京安徽同時危急，天王下詔在外將領勤王，沒有人奉詔來救。天王止得封秀成爲忠王（王成先封英王），都督中外諸軍。秀成威信極高，親到安徽霍陽鎮（桐城縣東南）大會各鎮將領百餘人，慷慨誓師，諸將都願服從指揮，太平軍重新團結起來。在樞陽大會上定計先破江北大營，通南京糧道。八月，秀成聯合王成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勝保馬步軍，殺萬餘人，又大破張國樑援軍，江北大營潰散，南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李續賓得九江，乘勝進攻安徽，連陷太湖，潛山，石牌，桐城等地，九月，攻三河鎮。陳玉成率兵往救，李秀成援軍纔進，大破續賓軍。李續賓是湘軍主力，一戰被殲滅，文武官死四百餘人，兵卒死六千餘人。反革命所受打擊，止要看胡林翼自供就很明白，他說：『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於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這兩次大捷，都由於陳李兩軍聯合作戰，此後陳玉成經營安徽，拒湘軍進圍安慶，李秀成守浦口，拒江南大營攻入南京，陳李兩軍各當大敵，事實上不能機動佈置互相救援了。

陳玉成安慶保衛戰

咸豐九年，曾國藩胡林翼定策，合湘楚兩軍水陸全力，四路進攻安慶。陳玉成聯合張洛行龔得樹

等捻軍十餘萬人奮力抗擊，激起革命反革命空前激烈的戰鬪。正當兩軍在太湖潛山一帶惡鬪，十月，池州（貴池縣）守將李茂投降湘軍。情勢驟取無備，太平關、建德等處，立功贖罪。這個無恥的叛賊，久踞池州，所部不下數萬，強悍衆多。且係狗道（曾胡強拍陳玉成，呼爲四眼狗，狗道以洩忿）舊屬，於用兵機謀，早能窺破。（胡林翼致楊昌福書）。曾胡如獲至寶，賞他一萬兩銀子，一個遊擊一虛銜，他也表示一投誠歸順，無有二心，請調赴皖北，以圖報効。他要取得信任，對玉成軍確起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九年十一月，兩軍大會戰，十年正月，玉成軍戰敗。胡林翼稱這次戰爭爲一軍興數年以來僅見之大戰（克復太湖縣城疏）。一計次血戰似係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復官文書）。當一前敵軍情，萬分吃緊的時候，忽得曾國藩幻想「狗已冥詠」，胡林翼急得「近月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罵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致曾國藩書）。大戰的結果，太平軍失去太湖潛山兩個縣城，湘軍曾國荃進駐賢關，開始圍攻安慶。

陳玉成戰敗退軍，會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營。胡林翼料到太平軍敗後定要反攻，惶恐地說「不過三個月，狗枝又壯，狗膽又雄，營其吁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七年矣，竟未能磨滅此賊」（致丁月台書）。五月，他請求咸豐帝允許添募湖南勇了說「去冬今春兵力未分，四眼狗陳玉成以十萬之賊，西犯以救潛山太湖，臣等與曾國藩合力圍謀，血戰月餘，屢潮於危，幸而勝之。今則江東各路全軍被敗（指江南大營潰散），賊勢既無所顧忌索繼，必挾全力全勢悉數西犯以謀楚軍，是楚北皖北之危迫情形，不得智士而已知之矣」（奏陳等發招募並軍情賊勢縷晰情形疏）。他竭力籌

備戰守，嚴密戒備，趁王成軍在下游，能保揚善鎮，彭彭水師攻取權陽。他說：「權陽爲安慶之咽喉，不得權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制賊要害，亦不關賊消癘。」五月，楊彭督率章俊部血戰攻破權陽。這個叛賊立了大功，胡林翼寫信給曾國藩說：「韋軍血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良苦。」要國藩令章俊率重兵守權陽，並保薦他得官職。太平軍失權陽，安慶形勢愈益危急。

九、十月間，王成率黃文金、楊輔清、吳汝孝等軍，聯合捻軍襲得樹，孫奎星等十餘萬人救安慶。曾國荃被猛攻，準備撤退圍攻軍，章俊自權陽出兵斷絕練潭餉道，王成軍乏食，國荃用章俊計，屢獲勝利，王成退歸桐城。

與王成救安慶同時，李秀成自浙江回南京，奉天王命援皖。江西湖北各州縣起義首領四十餘名，派人向秀成「公呈降表投軍」，約定接應太平軍。秀成軍攻破皖南黟縣，入浙江轉向江西進發。

咸豐十一年春，陳玉成直搗胡林翼的老巢——武昌，李秀成直搗曾國藩的老巢——祁門，造成太平軍與湘楚軍戰爭以來最緊張的一次大戰。陳玉成軍自桐城經霍山縣攻入湖北，沿途打敗守軍勢如破竹。二月，攻克孝感，黃州，德安，隨州，黃安，黃陂等城，民衆武裝響應。僅德安一處，就有二萬二千餘人。當時胡林翼率楚軍駐太湖，助曾國荃圍安慶，不曾想到王成行軍「風馳雨驟，晝夜兼行」，飛調水陸援軍，一時統不濟急。武昌城總料滿人官文，昏聩無能，守城旗兵綠營兵總數不滿三千。他料定武昌必失，大勢已去。本來太湖大戰，已經嚇成大病，這一次悲觀已極，索性連「軍報亦廢擱不閱。五心燒熱如火炙，夜間尤甚。咳嗽吐濃紫色血」，希望速死（八月裏吐血死去），說：「生

死之際，如倦極思得一睡，睡若便安，即沒吾寧也」（與曾國藩書）。這個危局怎樣得救呢？咸豐八年，英國在漢口取得租界，它用武力阻止陳玉成渡江取武昌，把一羣反革命從絕處救活了。玉成分兵協助人民守城，自率萬餘人回救安慶。

李秀成屢破曾國藩軍，二月攻克景德鎮，絕曾軍餉道。曾國藩是向來不上戰場的，這時候急了，三月，親到休寧督各軍攻徽州城，希望打通浙皖交通線，一戰大敗，逃回祁門。秀成軍圍祁門猛攻，曾國藩困守絕望，寫遺囑給妻子，準備自殺。這個漢奸頭子三次尋死，靖港，鄱湖是倉皇失措，這一次是計窮力竭，形勢比前兩次更嚴重。自然，所有漢奸都拚命救他，左宗棠在樂平打了大勝仗，秀成撤圍入江西，攻克大部份郡縣，把安徽放鬆了。他有江西湖北起義首領和民衆接應，行軍順利，五月，由吉安，瑞州進佔修水，武寧，逼近湖北。胡林翼全力抵禦，節節敗退。六月，秀成佔領興國、大冶，通山，通城，蒲圻，崇陽一帶城池，武昌萬分危急，嚇得在太湖的胡林翼「咳逆彌甚，嘔血日升，餘，形銷神瘁，氣息奄奄」（奏陳病勢增劇懇請開缺調理疏）。秀成無意進攻武昌，長江被湘軍水師封鎖，也不能渡江到北岸，望見楚北的玉成軍旗幟，無法會合。他收得起義民兵三十萬，退出楚南，經江西攻入浙江。

三月間，玉成率馬步精兵回救安慶，與曾國荃水陸軍大戰，不能取勝。他留下劉璋林率「平日第一枝悍黨，戰守可恃」（曾國藩語）的精兵守集賢關營壘，自己去南京求救。五月，曾軍攻破集賢關，劉璋林被殺。這次戰敗，損失異常巨大。曾國藩說「杏岑逆自滋擾以來，我軍所斬長髮老賊，至多不過數百名。此次殲除長髮老賊至四千名之多，實爲從來所未有」（官軍圍攻赤岡嶺賊壘悍賊殲除

摺)。胡林翼說蔭林是『嘗譽著名，詞眼徇所依頓，此次就擒，老賊誅戮殆盡，功抵塔忠武（塔齊布）岳州李忠武（續賓）九江突』（致曾國濟等書）。王成得到敗報，趕回再救安慶，但精銳喪亡太多，雖經幾次血戰，仍不能挽回頹勢。八月，安慶終於陷落了，守將葉芸來率全軍戰死。

陳玉成想去湖北招兵，『不意將兵不肯前去。那時兵不出將，連夜各扯隊出六安而下廬州，英王見勢不得已，亦是隨回轉到廬城。英王見勢如此，主又嚴責，革其職權，心煩意亂，類老於廬城故未他去。坐守廬城，盡忠於國』（李秀成自述）。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四月，廬州失守，玉成率殘兵往壽州，被圍練苗浦霖誘獲，獻給清帥勝保。這個太平軍兩大支柱之一的英王爲革命犧牲了！他死時還止有二十六歲。

陳玉成的主要對手是胡林翼，他怎樣畏懼王成呢？他說『賊勢較石逆爲少，賊計較石逆爲狡爲悍』（致金觀泰書）。他尤其畏懼玉成的深得民心，在致蘇濟村信裏說：『昔年民欲賊來，不肯清野，近年民不願（？）賊來，然尚不肯清野也。欲清野，尙待創深痛鉅之後。』於是自己率領一羣民賊來製造『創深痛鉅』，致州縣官要『居今日而圖治，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必須棘手示懲，使知畏法』（復甯陽縣費月樞），這等於說『不聽反革命的命令者殺無赦』。又致軍官放火燒城，說『得城之時，密派勇丁各持一炬，將城內大小房屋米糧付之一炬，片瓦不留，則異日必無賊可守矣』（復吳幹臣）。統治階級推崇備至的『胡文忠公』，就是這樣指導殺人放火的一個強盜，他還強迫文武官員搶糧，在札余副將霍山縣裏說：

查霍山樂兒嶺附近等處，士民無仇賊之心，有助賊之意，將所有穀米屯聚，不暇不售，以致

兵食缺乏，試問是何居心？廬山余副將嚴查有穀有米之家，出示封鎖，勒令運營出售。如該處士民始終抵抗，其中必有不明大義甘心助賊，阻率阻礙之紳民。仰即查明緝斬十數人，並將米穀充賞。倘該督有心討好，不知輕重緩急，姑息養奸，定將嚴參。

紳民有米不願出售，這就該「緝斬十數人」麼？他又不反省一下，爲什麼紳民「有助賊之意無仇賊之心」？不是官實際是民賊，而所謂賊實際是民友的錢證麼？自然，民賊是不能反省的，因爲他們的頭腦是剝削階級的。試看他「致前敵各營書」：

粵逆竄擾以來，皖民受禍既久，迷溺尤深，誠恐軍行之際，賊黨造作謠言，蠱惑人心，果於從逆，亟應出示曉諭，破其從賊之惑，予以自新之途，亦解散賊黨之一法……俾其家輸戶曉，去邪歸順，實爲至要。

人民解放叫做「受禍」，覺悟叫做「迷溺」，當滿洲奴隸叫做「去邪歸順」，堅決反抗叫做「果於從逆」，這就是從民賊們特殊頭腦發出來的特殊言語。

民族英雄陳玉成被反革命殺害了，還被描寫成殘暴無比的「狗逆」，究竟誰是狗是逆呢？可看英國人合利「揚子江日記」：

此處（指南京上海大連地方）村落，荒苦不堪言狀，其破壞之遺跡，大部政府黨兵士蹂躪之所爲也。太平黨兵士之蹂躪，棲霞寺院，瓦礫無餘，此其遺跡，所在皆是。而政府黨兵士之蹂躪，則父老痛哭而談，以爲蒼淫婦人，恣意殺戮，慘無人道。太平軍之暴行，不過強人民爲其運輸糧食，若凌辱婦人，則往往處以死刑，罪人之首，高掛於犯事之地。尤記太平軍之名將所謂英

王者，訓其部下，不得妄取民間一物也，政府黨之兵士不及遠矣。

李秀成南京破圍戰

江南北大營是咸豐帝與曾國藩也是滿與漢矛盾的產物。咸豐帝的計劃是湘軍出力，江南北大營收功，因此對它特別重視，兵額增至七萬人，餉源指定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廣東，江西，幾乎佔東南財力的大部份。大營唯一戰將張國傑與和春成見很深：軍隊是滿人，兩廣人，各地土匪流氓的雜合體；軍風紀是一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戰事爲意。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家室之私，或羣與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淫心蕩志，極樂忘返（胡林翼飭各統帶查辦各營）。它逼近南京，形式上成爲可怕的大敵。但實際大敵是上海的湘、楚軍。太平軍對江南北大營應取守勢，可小攻不可大破，對湘、楚軍應陳李聯合，全力攻擊，首先要確保安慶。

咸豐十年正月，張國傑攻陷九袱洲要塞，南京震動。胡林翼給曾國藩信說：「江南得九袱洲，敵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曾胡看得很真切，一心爭奪安慶，李秀成却看錯了，定策消滅大營。秀成率精兵自皖南攻入浙江。二月，破杭州城。大營分兵救浙，秀成軍從間道馳回南京城外，玉成軍也從上游來會。閏三月，大破江南北兩大營，和春張國傑敗死，大營潰敗。這次戰爭在革命反革命雙方都是重要的關鍵。太平軍方面，李秀成着重下游用兵，想佔領江浙兩省作根據地，他到江西湖北，是招收投軍新兵，目的不在爭奪上游。陳玉成往來江北成了孤軍，得不到秀成軍以有力援助。從聶太平軍形成江南北兩個獨立軍，勢力分散，江浙軍事勝利，反加速南京

的陷落。反革命方面，咸豐帝計劃失敗，不得不全部依靠曾國藩，給他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的軍政實權，指揮統一了，餉源充裕了，反對派不敢爲難了，湘軍的勢力和地位從此大進一步。左宗棠聽到大營潰散，歡喜道：「天意其在轉機乎！江南大營將盡兵疲，豈足討賊，得此一番洗滌，後來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聽到曾國藩得兵權政權，喜歡道：「淮御誠得督符兵符，則否極而泰，剝極而復，天下士氣爲之一振」。反革命的喜歡就是革命的悲哀，李秀成還在注目江浙上海，不急救安慶，敗局不可挽回了。

後期革命形勢——被圍失敗

安慶失守，南京危在旦夕，正是太平軍振作精神，死裏求生的緊急關頭。李秀成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可是洪秀全和洪氏集團要腐化的習氣太深，眼中正看見南京一座孤城，心中正依賴天空一位上帝；拒絕李秀成棄城流竄，向遠大處現實處開闢新環境的建議，終不免於亡國慘運的迅速到來。

楊韋內訌後，洪秀全在精神上消失了永安以前的發皇氣象，也消失了內訌以前的信人勇氣，繼續增長的却是暮氣沉沉的保守思想。他要保守自己的地位，對臣下採取有疑已沒有團結，有微罰沒有愛護的消極手段。像李秀成陳玉成那樣忠義有功人人信服的大臣，却更遭他的猜疑，竟亂封九十多個王來互相牽制，防英忠兩王跋扈專權。結果人心不服（李秀成語），「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敢不相救」（曾國藩語），太平軍呈瓦解現象。重要將領許多投降滿清，出死力攻擊太平軍，都成了滿清的

猛將，這固然是由於叛徒們無恥貪生，出賣革命，但秀全猜疑政策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洪氏集團專擅政權，把楊秀清時代建立的聖庫，聖綱制度破壞無遺。照李秀成自述所說：「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強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京城，渠滿城蓬屋查過，有米銀等物，任其取用，不敢與爭。日日按戶查尋男女（人口），不得安然。」就在最後一次圍城中，還是「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派人巡查管轄，我（秀成）在京並未任圍城之事」，見秀成「慈愛軍民，恐有圖害國之心，謬言我（秀成）忠而變奸」。李秀成說「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事實上洪氏集團正是秀全猜疑政策的一種表現。

洪秀全和洪氏集團本身並無兵力，不能抵禦反革命的攻勢，握兵權的李秀成，軍事上自有一種見解，與洪秀全不合，對洪氏集團更覺嚴重的對立。太平軍內部分歧，力量分散，大局無法挽救，但天國還能延長三年，這全靠李秀成爲首的一枝軍隊對革命無限忠誠和江浙人民對革命的有力支持。

咸豐十年閏三月，秀成軍破江南大營，追擊潰兵，四月取得常州、蘇州、嘉興等地，江浙肥沃地區大部份歸入天國領土。這種意外迅速的戰勝，與其說太平軍的勇猛，不如說人民力量的偉大。例如李秀成到蘇州城外，「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民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原文當是賊字）官兵」。秀成在新領土施行善長政治，民心悅服，合力守衛解放地區。滿清江蘇巡撫薛煥勾結美國人華爾率洋兵進攻青浦縣，秀成率兵迎擊，「兩陣交鋒，鬼兵大敗，殺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槍二千餘條，大砲十餘條，洋刀三百餘口，舟隻數百餘條，當解青浦之圍」（李秀成自述）。乘勝

攻克松江，進兵至徐家匯，離上海十八里（曾國藩也承認「上海舟師大掙，危迫殊甚」）。英法兵營滿留守上海城，秀成準備進攻，因嘉興方面軍情緊急，退兵救嘉興，上海解圍。

這一次追擊戰，是洪秀全、陳玉成解救安慶的計劃。原計劃是「派楊輔清、李世賢、李秀成等直取蘇常，再攻徽浙，以入江西；又派吳如孝、張洛行、由定遠、壽、穎、六、霍入湖北，定於秋間，四路大舉」（曾國藩安慶軍營搜獲陳玉成自南京發來密件）。這計劃確打中了滿清的要害，反革命全體大恐慌，議論紛紛，都注目到下游地方，咸豐帝認為湘軍「規取安慶，顧兵堅城，即使安慶得手，亦屬得不償失」，嚴令「曾國藩接奉此旨，即統率所部兵勇，徑赴蘇州，以保全東南大局，毋稍遲誤」（十年四月上諭）。老奸曾國藩胡林翼是不動搖的，他把湘楚軍主力死釘住安慶，奏稱「但求立脚之堅定，無論逆氛之增長」（曾國藩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摺），一面保薦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分任浙蘇贛三省軍務，自己督大軍全力進攻安慶，洪陳計劃被曾胡破壞了。

李秀成似乎不曾參與洪陳謀議，自述說「自六解京圍（江南大營潰敗）之後，息兵三日，天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肅清回奏。人生斯世，時為其用，不得不從」。他出兵是勉強的。後來用兵順利，民情愛戴，又見物產富饒，洋兵易打，產生取江浙作根據地的思想，對上游甚至南京比較看輕了。九月，陳玉成在安徽大戰，「天王嚴詔頒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領軍而掃北。山蘇動身到京，將來情啓奏，不欲掃北。我主盛怒，責詞難堪。此時亦無法處，出師而上江西湖北」（李秀成自述）。是時江浙並無大敵，曾胡又不曾中計，調秀成軍援皖是完全必要的，不過那種強迫命令的方式，使秀成不能忘情江浙。咸豐十一年上半年經江西入湖北，收新兵三十萬，石達開部

逃兵二十萬，又回到江浙來。陳玉成在皖北戰敗，奉調秀成兵千餘人防守安慶，秀成不其願意，並預料「其省不能保也」，集賢關慘敗後，又不撥大兵助玉成恢復實力。安慶失陷，秀成至少要負敗不相救的責任。

安慶失陷的危險性與曾胡的戰略目標，秀成沒有足夠的認識，加深了洪秀全及洪氏集團對秀成的猜疑與裂痕。洪秀全的戰略思想若重在上游，用兵江浙正是牽制性質。咸豐八年三月滿清與英法（兩個主要侵略者）訂天津條約，出賣長江流域，十年九月又訂北京條約，更進一步合作來反對革命，秀全深知這種情形，用兵限於江浙內地，不攻上海，避免與侵略者直接衝突（自然，侵略者還是要進攻的）。賴文光說「忠王李秀成，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賴文光自述）。忠王經營江浙，顯然與秀全意見不合，是違反「君命」的自由行動。洪李間失和，雙方都該負責，但在力爭上游這一點，秀全並不錯誤。曾國藩稱「洪逆老於戒行」，是見反革命是認識他的。

李秀成於十一年六月，自湖北經江西攻入浙江，克浙東各府縣，十一月，克杭州省城，浙西相繼攻克，浙蘇兩省膏腴盡為秀成所有。曾國藩稱「江浙賊勢浩大，盡占富庶之要區，廣收官軍之降卒，財力五倍，人數十倍」，太平軍的聲威，確把一切反革命駭倒了，連曾國藩也動搖起來，要曾國荃速旨去救蘇杭。國荃却說「不然，金陵為賊之根本，我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投護，而後可以圖蘇杭之地」。國藩因此又堅持原定計劃，派國荃到湖南添募新勇，準備進攻南京。滿洲主子西太后給國藩節制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省軍政大權，並公開宣示「江浙等省軍務朕准曾國藩是賴」，這是滿洲皇帝第

一次對漢族奴才低頭，但這個奴才有誰可賴呢？當然，他止有向外國侵略者屈膝求賴。

曾國藩的計劃首先依賴外國侵略者保護上海，說「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藩通籌全局摺）。其次是想乘太平軍英勇抗擊侵略者的機會，從中取利。他說「臣處搜獲偽文，亦知金陵洪逆，詞意不遜，與洋人呼聲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爲難得之機，自當因勢利導，彼此互商，嘉其助順，聽其進兵。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殆亦天亡粵逆之會也」（三月籌議借洋兵剿賊摺）。他又規定對洋兵應取的奴隸態度，說「臣當諄防命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信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六月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他那種對太平軍幸災樂禍，對侵略者奴顏婢膝的漢奸民賊思想，被一切反革命份子奉爲典範，李鴻章，左宗棠都依樣實行了。李秀成叙述當時漢奸軍「忠信篤敬」的情況說「鬼兵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人或者，鬼把城門。凡見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官兵不敢與言，清朝官兵多言者，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但漢奸軍還有另一副鬼臉面目，李鴻章與彭玉麟書說「賊軍（「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借作，以輔其力所不逮也」。這樣絕非人類所有的殘忍性，甚至戈登也以爲太甚，斥責李鴻章，鴻章的答覆說「此中國而非歐洲也」。這就是說按照中國統治階級的特性應該瘋狂屠殺中國人民。

李秀成佔領江浙，外國侵略者當然要武力干涉。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率淮軍八千人到上海，聯合英法軍「常勝軍」開始對太平軍作戰。太平軍抗擊反革命聯軍，勇敢堅決，充分表現中國人民無限

的英雄氣概。反革命聯軍有強大的力量：第一，英國法國駐滬海陸軍配備着當時最新式的武裝；有英法反動政府作後盾，聲勢最盛；第二，美國流氓華爾統率的『常勝軍』，人數約五千，外國軍官約一百五十人，軍餉每年多至九十萬兩，每攻下一城，滿清酬華爾本人銀三萬或三萬六千兩（戈登攻下蘇州酬銀八萬兩），將佐兵士得大掠城中財物人口，作爲酬報。『常勝軍』是一枝新式武裝的強盜軍隊，有居住上海的官僚、地主、買辦、紳士、商人作主要後盾，這些人把華爾當作救星，大商人楊坊送女兒給他，鼓勵他的戰意。李鴻章統率的淮軍是一枝屠夫軍隊，武器用外洋槍炮，專跟在外國軍隊後面補充殺人並搶掠剩下的財物。它有整個統治階級作後盾，被認爲江蘇方面的主力軍。這個聯合軍是反革命的結晶體，力量不容輕視，但李秀成却打了一連串的勝仗，不曾失敗過。聯合軍一敗於太倉，再敗於嘉定，三敗於青浦，法水師提督普羅帖戰場斃命，英法軍棄嘉定青浦兩城逃走，李秀成說：『那時洋鬼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確是事實。不過戰爭勝利，並不能挽救南京的危急。

正當秀成在下游用兵，五月，曾國荃圍逼南京，紮營雨花台附近。天王調秀成軍來援，秀成集眾將會議，議定『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曾國荃決戰』，天王急了，『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秀成被迫救南京，閏八月，親率大軍三十萬號稱六十萬進攻圍城軍，大戰四十六日，曾國荃死力抵禦，曾國藩飛調『常勝軍』應援，『常勝軍』不敢前來，形勢極極危急。秀成軍因『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部下各王不肯齊心合擊，曾國荃得機倖守住營壘。『自攻未下，我主嚴責革職，調我當殿明責，即飭我進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李秀成自述）。當時上游反革命兵力薄弱，賴文

光、陳得才在湖北河南陝西行動，聲勢浩大，洪秀全派秀成北進，會合賴陳軍，從上游來解救南京，原不失爲一個計劃。可是疑忌秀成過甚，既傷他的威信，又奪他的兵權，調遣秀成『手下各將，任其次兄洪仁達亂爲』，江浙留守軍，無人調度，任其自行。君臣上下互相疑怨，離心離德，全局更接近瓦解的形勢。秀成率孤軍轉戰江北，進到安徽壽州。會國藩無法，定計『急取金陵老巢，以攻其所必救』，同治二年五月，竭全力攻破雨花台及紫雲門外諸石壘。那時『京內驚慌，天王差官捧詔，召我（秀成）回京，當即分軍回轉』，軍士戰死，落隊及饑寒病死前後失去十數萬人，戰鬥力大受損傷。

南京陷落，這時候已經決定了。李秀成建議：『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棄城別走有兩個方向。走向上游聯合賴陳軍，捻軍回軍，在北方發展，證以後來捻回的強大，建立新國不是不可能。走下游佔江浙閩粵沿海各省，利用同情革命投効太平軍的不少外國友人，運入新式軍火，繼續抵抗反革命聯合軍，也可以支持危局。會國藩深怕太平軍『變爲流賊，更難收拾』，是見秀成這一建議是可以實行而有效的計劃。在反革命方面，當時湘軍已是精疲力盡，矛盾到處發生。首先是滿洲主子對會國藩的猜忌。會國藩滙陳餉緝情形片說『論兵則已成強弩之末，論餉則久爲無米之炊，而戶部奏稱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廣攬權利。臣雖至愚，豈不知古來竊權利者，每遭奇禍。外畏清議，內顧身家，終夜悚惶，且憂且懼。』其次是湘軍本身腐化沒落，『臣帶兵九年，今年始有餉匪兵逃之事』（同治二年會國藩近日軍情並陳餉緝情形片），湘軍初起『用儒生將農人，今則所謂儒者不儒，農者不農』（湘軍志營制篇）。其三是新起的左宗棠老湘軍，李鴻章淮軍自成勢力，用兵各主已說，不受

會國藩調度（湘軍志會軍後篇）。反革命陣營有這許多裂痕，如果洪秀全聽從秀成的建議，自率一軍北進聯合捻軍，命秀成回江浙圍結部屬，攻擊沿海各省，南北呼應，重振戰局，滿清必然驚慌失措，即使調湘軍追擊，在滿漢矛盾下（北方清帥管文、僧格林沁地位比會國藩高，仇視湘軍），會國藩喪失漢奸信用，無法再施展湘軍的長技（湘軍失長江水師又無馬隊，戰鬥力減去大半），無疑的要潰敗。可惜洪秀全疑秀成有異心，更清軍防內變，不放秀成出京，君臣困守危城，坐待滅亡，給左李在江浙方面順利地擊破各個孤立的太平軍守將。

左宗棠攻陷浙江省

同治元年正月，左宗棠從安徽進入浙江衢州城（滿清在浙江唯一的城池），太平軍大將李世賢阻擊左軍，到六月，左軍還不能出衢州境。閏八月，世賢回援南京，左軍才得沿錢塘江進攻。浙江的失陷，左軍和江蘇李鴻章軍一樣，都是跟在外國反革命軍後面，做殺人、收地、搶掠的工作。外國反革命軍的取得勝利，却因太平軍失去李秀成的領導，各城孤立無援，軍心動搖，沒有整個戰守計劃。浙江失陷，不從左軍入衢州城開始而是從英法軍攻陷寧波開始。

同治元年四月，英法軍艦砲擊寧波城，英法陸軍聯合滿清寧紹台道張景渠所率海盜攻城，太平軍退至鄉間抵抗。李鴻章請華爾自上海率「常勝軍」往援英法軍，至慈谿縣（離寧波三十里）被太平軍擊斃。

閏八月，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輪船到定海，會同官兵民團合剿「海盜」（左宗棠定海兵團會同輪

船搜捕海盜情形片)。

十月，「法國因寧波海口吃緊，願將伊國副將勒伯勒東權受中國職任，帶兵防剿。該副將在寧波所練中國兵丁一千五百名應給餉項，即行按照舊章（「常勝軍」舊章）支放」（發給勒伯勒東簡憑片引上諭）。

十一月，上諭「左宗棠、李鴻章奏中外官軍（可恥的名稱！）攻克上虞縣城一摺……惟據法國哥士魯言及蘇城竟日，而城中絕無動靜，遣人往觀，始知賊已宵遁。與此次所奏官兵奮勇登城，賊由西南逃竄情形不符。與外國人共事，全在乎以誠信，若稍有粉飾，即爲所笑，嗣後務須據實詳報，不得一字虛假」。反革命首魁曾胡左李都是這樣的一個騙子，止是這一次不幸被外國反革命揭穿而已。

同治二年正月，上諭「據李鴻章等奏，英國擬派白齊文，法思爾德會帶「常勝軍」，法思爾德現往寧波防剿等語。花旗國副將法爾師德是否即法思爾德」。

正月，署總兵勒伯勒東傷故後，洋將賈志勳繼之。臣飭蔣益澧一軍會同洋將進規紹興，密囑蔣益澧與洋將共事，惟守禮示信，勿計功據利，致啓爭競之端」（奏報連復六縣布置情形摺）。

二月，上年勒伯勒東傷故後，法國參將賈志勳權受中國副將職任，來寧接帶該營兵勇。英國總兵張樂德克親運大砲到營籌剿紹郡賊匪。正月初一日，張樂德克、賈志勳帶領洋兵花綠頭各勇，車輪大砲徑攻西郭門。突有黑洋人五六十名助賊施放洋槍，彈入賈志勳腦左，登時殞命。（查明法國參將陣亡請卹摺）。

五月，富陽久圍不下，增募外國軍助攻（湘軍志浙江篇）。

八月，迭次助剿最爲出力之英國領事夏福禮、總兵嵇樂德克、法國參將德克碑，稅務司日意格、教士田雷思等九員，臣細加考核，克復各城，外國官兵實屬出力（外國官兵助剿出力請酌賞物件片）。

八月，楊政讓率水勇，德克碑率砲勇。此次中外官軍會攻富陽，其苦戰克城，以法國總兵德克碑爲最（奏報克復富陽縣城摺）。

據李秀成自述，鬼子兵攻破寧波得賞銀之後，又領賞銀來打紹興，錢塘江上游太平軍恐後面斷絕，陸續放棄金華、龍遊、嚴州、溫台等地，退屯富陽。左軍才得順流而下，請鬼兵由水路攻城，配令鬼兵砲隊，連戰數十仗，鬼敗，又調鬼兵多來，攻破了富陽城，秀成自述與湘軍志符合。

十二月，洋將德克碑帶花勇前來助剿，並令淺水輪船點放開花大砲（攻剿杭州餘杭情形摺）。

同治三年二月，德克碑開放大砲，轟坍城壕數丈（附陳杭州餘杭攻剿情形片）。

三月，法國參將德克碑此次助攻杭城，每次攻剿，極肯出力，杭城克復，實著勞績。臣等給敘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洋將助克杭城出力擬請獎賞片）。

以上都是左宗棠勾結外國反革命軍（左與李鴻章不和，請法國人組織『常捷軍』與李對立）屠殺中國人民的一切自供，浙江人民就在這樣可恥的『中外官軍』共同屠殺下又被奴役了。

李鴻章攻陷江蘇省

華爾死後，美國人白齊文繼任。同治二年，英國人戈登代白齊文統率『常勝軍』，用英國大砲五

十二門會同淮軍陷常熟、崑山等城。九月，進攻蘇州，「江浙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交足，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李秀成自述）。秀成到蘇州堅守，十二月，見內部有變，出城逃回南京。蘇州失陷，「常勝軍」乘勝攻破約五十城，所謂淮軍的戰功，就在跟着「常勝軍」大殺大搶。湘軍志說：「復蘇州時，主將所斥賣廢錫器至二十萬斤，他率以萬萬數」。容闈西學東漸記說李鴻章「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自然，大部份是後來貪污所得，不過在收掠江蘇時，確得大量財物，也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曾國藩會同李鴻章攻陷南京

江浙一帶太平軍一部份堅守湖州城，大部份轉入江西境。秀成帶來守城軍人數不多，因為南京食糧不能容納太大的軍隊。在危城中秀全疑忌秀成更甚，城內居民饑餓，「賊盜蜂起，逢夜聞城內砲聲不絕，搶劫殺人，全家殺盡，搶去家內錢物」。南京無法支持了。同治三年四月，洪秀全服毒殉國。六月，南京陷。蘇福烈烈的人民大革命因南京失陷，而暫時失敗了！

李秀成奉幼主洪福衝出城鴨街口，不幸散失，洪福逃往湖州，秀成藏匿民間，奸人向清營告密，被曾國荃捕獲。曾國藩從安慶星夜趕來，親自審問。秀成並無多言，止說「速將紙筆來，吾當書之，吾史館實錄，爲爾曹焚掠盡，吾不述，奚以傳後」。他在囚籠中寫天國始末，本人戰績萬字，並不隱諱天王亡國的原因，也不隱諱本人對天王的不滿。這當然不是對敵人誹謗自己，而是想借最後一個機

會流傳天國信史（會國藩也不得不承認『情事真確』），給未來的革命人民留一悲慘教訓，用心是極苦的。萬惡的會國藩既把洪秀全掘出遺體，『穢屍焚化』，又把『萬古忠義』（天王寫四字封秀成）的民族英雄李秀成『凌遲處死，傳首髮逆所到各省，以快人（獸）心』（會國藩賊酋分別處治粗審善後事宜摺），這已經是盡殘忍兇暴之能事，但會國藩還要對死者行最後的侮辱。他不僅刪去秀成自述至少一半，塗改字句不知若干，而且卑污到代造乞降語句和什麼『招降十要』『天王十誤』。會國藩明明說他『文理不甚通順』，而這些偽品恰恰文從字順，與真品顯出兩手，又明明說『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道，在途或不食而死。『秀成如果真有乞降的意思，正可『誘以甘言，許以不死』，爲什麼怕他『在途不食而死』？會國藩所代表的這類人，自己極濁黑暗，却忌別人的清白光明，定要讓死人也蒙些不潔才快意，真是狗彘不食其餘的可恥懦夫。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戰略研究 華 岡

黑暗中的躍步

太平天國革命是民主性民族性的農民戰爭，是以反清戰爭的雄姿出現的。因為自滿清入主中國，在中國就形成了一種變重的封建榨取與民族奴役關係：一方面地主豪紳、高利貸者與商業資本構成了剝削農民與手工業工人的三位一體，而滿清皇帝就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地主。他直接搶奪漢族人民的土地，把所搶奪的土地一部份歸自己管轄，稱爲皇室莊田；一部份分給皇族王公，是爲宗室莊田（或稱封地）；另一部份分給滿洲軍隊，變成所謂旗地。此外，尚有所謂駐防莊田、屯田、官田、學田、寺廟地產等等。滿清政府又利用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以積累財富，供給自己的揮霍享樂，因而助長了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參與封建剝削，使兼併土地更趨嚴重。

同時，滿清政府對於漢、回、蒙、藏、黎、苗諸民族，採取奴役壓迫政策，施行極殘酷的屠殺，所謂『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不過是傳聞至今的兩個較大的流血慘劇；其實，有清一代，類似這樣大規模的屠殺，正不知有多少。如果說清室的寶座就是用漢回諸被壓迫民族人民殷紅的鮮血所染

成，也決不能說是過分。

加以鴉片戰爭之後，清廷無恥媚外和壓抑人民自救運動，廣東人民自救抗敵的平英團，遂慘遭撲滅。而且清廷既割地賠款，因益加重苛捐雜稅，而貪官污吏橫行，結果『官逼民反』，中國遍地就盜匪如毛了。當時廣東廣西連年災荒，哀鴻遍野，富者創團練以自衛，而貧民『客家』饑寒交困，呼籲無門，這就是促成太平天國革命的直接原因。

沒有如上所述這樣深厚的社會根源與民族因素，太平天國革命不可能取得這樣豐富的力量，進行這樣雄偉廣大的橫掃中國的正義戰爭。因為滿清政府是當時黑暗的化身和一切矛盾的集中體，是幾萬萬中國人民痛苦怨恨的對象，所以這一民主性民族性的農民戰爭，就以反清的姿態而出現。

爲了便於活動與借助宗教對於羣衆的凝結力，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等太平領袖，就以上帝會作爲號召的旗幟和武器。到道光末年，因洪、馮、楊奔走活動的結果，上帝會信徒日增，遍及桂平、武宣、象州、藤縣、陵川、博白各州縣，形成一種很大的政治勢力。團練局倚仗衙門凌辱上帝會徒，上帝會則以『客家』貧民及紫荊山燒炭工人的精神團結爲對抗，於是水火日甚，爭鬪益趨劇烈。適慶遠、思恩、南寧等處盜匪蠢起，清政府令向榮、張必諶馳往鎮剿，上帝會乃利用時機，從容佈置準備起義。

到一八五〇年，即道光三十年，滿清官吏逮捕上帝會徒馮雲山、韋昌輝等，並加緊勒索燒炭工人，於是上帝會忍無可忍，遂山馮雲山領導起義於金田村。最初在金田村起義的農民與燒炭工人雖只有一千三四百人，但石達開在白沙，秦日綱在博白，蕭朝貴在陸川，亦同時起事，而貴縣林鳳翔、李

開芳，大黃江的羅大綱等，亦分別率領起義人民趕到金田村會合，合計就有一萬六千人。

金田村起義是中國漢族人民在當時滿清黑暗統治之下奮起鬪爭的一大躍步。滿清政府一直用殘暴的手段層層反抗滿清統治的漢族人民，以鞏固其反動統治。但在滿清政府殘暴的壓迫之下，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羣衆反對滿族和地主豪紳的鬪爭，遠在太平天國以前就已興起，並發展成爲連綿不斷的農民戰爭。這些農民戰爭，正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最近的先驅。這些先驅裏面，最著名的有一七七四年山東臨清的王倫起義，一七八一年甘肅回民馬明心的起義，一七九三年至一八〇二年北方五省的白蓮教起義，一八〇〇年的海盜起事，一八一三年天理教的起事及箱工暴動，一八二二年河南教民的暴動，一八三六年湖南武岡的農民起義，一八三八年貴州與湖北的農民起義等。這些農民起義的政治目標，都是反對滿清政府，但它們在積極方面都沒有提出更明確的主張，而且缺乏組織性。太平天國一方面繼承了這些先驅的英勇鬪爭，同時又把中國農民戰爭提到更高的階段。

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

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石達開、韋昌輝等在金田村開始起義，其勢即不可侮。清政府因廣西提督鄧祖霖紿剿不力，罷其職，改派向榮爲廣西提督，副都統烏爾泰幫辦軍務；移兵進剿，道光三十年十一月被洪楊擊敗，清副將伊克坦布被殺。洪楊既得初步勝利，乃於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一月進佔大黃江，分攻武宣、桂平、貴縣、平南諸邑，前鋒及到象州，都是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

軍。

滿清政府感到恐慌，派賽尚阿爲欽差大臣。八月，賽尚阿攻太平軍，烏爾泰與向榮分道追擊，而太平軍改趨大黎。這時烏爾泰軍被阻山內，清軍勢力分散，太平軍乃反擊向榮軍，遇雨，官軍無鬪志，而太平軍攻其所不守，向榮軍大吃敗仗，閏八月太平軍打進永安州。至此，太平軍開始建立政權，號太平天國，洪秀全被推爲天王，楊秀清被封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各王均受東王楊秀清節制。此外，又封洪大全爲天德王，秦日綱，胡以幌等爲丞相軍師。這一天是清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太平軍改元爲太平天國元年正月元日，亦即西曆一八五二年二月四日。

滿清政府見太平軍聲勢日大，益感恐慌，急命欽差大臣賽尚阿，調集清軍數萬圍攻永安州，向榮統北路，烏爾泰統南路。太平軍因這時尚不利與清軍作陣地戰，祇能以游擊戰和運動戰取勝，卽於太平元年二月衝出重圍，北趨湖南。清軍屢擊於山岡，天德王洪大全被擒，壯烈犧牲。適遇大雨，清軍得不到糧餉的接濟，太平軍乃集合力量猛擊清軍，殺清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鄒鶴齡，清軍敗退。太平軍因得補充，三月進攻桂林，烏爾泰跟蹤追擊，至六塘墟，離桂林僅六十里，太平軍奮力反擊，清軍復大敗，烏爾泰中砲死。

太平軍乘勝攻桂林，因向榮防守堅固，太平軍圍攻不克。四月，引兵去興安，攻克全州，入湖南境。軍事指揮的藝術，就在一旦發現敵方防守的實力很強，而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以壓倒敵人，就該另選標的，向阻力較小的地方進軍，讓敵人來應付你，而你却可運動自如，「乘人之所不及」（孫子）。

而且速度和流動性是運動戰中爭取主動的要件，太平軍搶桂林而攻興安，全州，是運用這一戰略的成功例子。

太平軍既入湖南境，乘湘水盛漲，擬順流直取長沙，南王馮雲山乘舟先行，大軍繼後。清軍江忠源看到這一着，急扼袋衣渡，渡口很狹，夾岸多林木，伐木爲檣，張旗幟爲疑兵。太平舟師果蔽江下，忠源扼擊之，鏖戰兩晝夜，太平軍挫敗，南王馮雲山陣亡，太平軍損失了一個優秀的領袖。於是太平軍在戰略上不能不改攻道州，連陷江華，永明，嘉禾，藍山，桂陽，郴州，軍勢復振。這次太平軍的吃虧，是由於自己戰略意圖被敵方所獲悉，走入了敵方的圈套，以致上當。幸而他們能够隨機應變，從危急中拔出自己的力量，改攻道州，把江華，永明，嘉禾，藍山，桂陽，郴州，這一大塊地盤，變爲自己的活動範圍，依然控制了攻擊的優勢。

太平軍由郴州進駐永興，徘徊未進，西王蕭朝貴獨率兵士數千人，克安仁，醴陵，進攻長沙，以兵力單薄不能合圍。清援軍紛至，而楊秀清以蕭未遵軍令，不予援助，蕭大憤，力攻南門，中砲陣歿。洪楊乃率全軍大圍長沙，以地雷轟城，城牆崩決三次，但清軍堅守，終未攻克。長沙久攻不下，清援軍四集，太平軍轉被包圍，糧草斷絕，軍心渙散，逃亡者日衆。

這時候，太平軍真到了一個困難關頭，幸而楊秀清想出了一條避重就輕，聲東擊西的妙計，趁着清軍幾十萬都聚在長沙，太平軍却於夜半解圍去，渡湘水而西，故意分小隊走湘潭，清兵遂盡向湘潭追擊，而大隊從容走寧鄉，益陽，出臨澧口，渡洞庭湖，逼岳州。岳州文武官吏棄城爭遁，太平軍不戰而佔岳州。盡取資藏吳三桂軍械飽位，增強太平軍武裝，分乘大小木船五千隻，蔽江而東，破漢

陽，佔漢口，以鐵索繫船爲浮橋，渡江圍攻武昌。太平二年（一八五二）十二月十二日（陰曆初八日），以地雷轟文昌門，遂克武昌省城。這時一方面摧毀了反革命的重要堡壘，一方面擴大了革命在羣衆中的影響，新加入戰鬥的羣衆多至五十萬，滿奴所謂五十萬男婦盡是俘虜，這簡直是將太平軍神話化了！

太平軍這一次行軍的神速與戰略戰術的成功，在世界戰爭史上都佔着很光榮的位置。進軍應選擇阻力最小的地方，什麼地方阻力最小呢？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阻力最小，敵人最想不到地方阻力最小。所以揭虛與繞襲，爲收效最大的軍事行動。孫子十三篇會說過：『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又說：『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戰略的用處，正是要使每一次戰鬥中，能在時間上空間上，都使自已處於最有利的環境，而強迫對方處在最不利的形勢之下。如果太平軍死死圍困長沙，不知道改變方針，必然會陷於被清軍內外夾攻，或竟有被撲滅的危險。所以太平軍這一避實擊虛聲西擊東的戰略，不僅挽救了太平軍，而且發揮了運動戰的長處。太平軍又常常使用運動及巧妙的側背威脅代替正面戰鬥而取得勝利。所以太平天國的士兵說：『我們的天王東王發明了一個新的作戰方法，也不用我們的槍打仗，却用我們的腿打仗』。

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軍率衆五十萬人，沿江而下，在武穴擊敗兩江總督陸建瀛所部官軍，下九江，佔安慶。二月十日下午南京，即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府，並改稱南京爲天京。太平軍自廣西金田起義，到佔領南京，爲時不過兩年三個月。出廣西，走湖南，破湖北，歷江西，經安徽，入江蘇，橫掃數千里，雖有幾次遭遇挫折，結果均能轉敗爲勝。

太平軍在初期所以有這樣大的勝利，是因爲太平軍是新起的革命軍隊，代表當時被壓迫民族（漢族）和被壓迫的人民，反滿和反封建官僚地主的民族仇恨和革命情緒，曾是異常高的。太平軍各將領都能發揚革命軍的優點，發揚革命軍的進攻精神。在決定戰略戰術時，一般說來，尚不被動，而能力爭主動，軍事行動不遲緩，而能迅速和機動；不採取消極的防禦，而採取積極的進攻。加以太平軍很少損害人民的利益，反之，人民却從太平軍得到了一些利益。因此，人民擁護太平軍，軍民關係尚好。如陳恭祿所云：『太平軍自湘入鄂，勢如破竹，掠取城市財物，綽然有餘，不擾鄉民，反而分恤貧苦之人，又豁免三年錢糧，貧人爭先附之』（見陳著中國近代史第一四六頁）。反之，清軍與人民關係惡劣，清軍官兵在營中吸食鴉片，聚賭賭場，出營強奪人民的財產，強姦民間婦女。『清軍潮湧入湘，姦淫搶掠，人民恨之切骨；稱頌太平軍之不姦殺焚掠，張德堅於賊情彙編曰：賊至爭先迎之，官軍至皆罷市』（同上），可見當時清軍與人民關係之惡劣到如何程度。

北伐和西征

一八五三年二月，太平軍攻下南京，在政治上設府定都，制定了種種新的法令和制度，如天朝田畝制度等，凡『清季之廢科舉，尙新學，禁吸煙，重衛生，戒纏足，崇女教，民國之易服制，改陽曆，尊約法，提倡新思潮等，莫不於是時曾爲一度之試驗』（見太平天國野史凌序）。在軍事上，則繼續遣兵北伐和西征，分兩路出師：第一路爲林鳳翔，李開芳所統率，先後攻陷鎮江、瓜州、揚州、

即留曾立昌部據守揚州，林李自己則率北伐軍於三月渡江入皖北，過濉州，破臨淮關。四月，經鳳陽府，與吉文元合軍入河南，克永城。五月，破歸德府，殺清參將正倫，知縣呂贊揚等。進攻開封，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不克攻城，而滿清援軍復四集，乃解圍去。過朱仙鎮，破中牟、鄆州、汜水、鞏縣，渡黃河圍攻懷慶，爲清軍納爾經額所敗，喪大將吉文元。林李乃長趨而西，破曲沃，克平陽府，清軍勝保圍之，鳳翔開芳求援於天京，楊秀清派朱錫珉、黃益芸往援。抵六合，中伏兵敗。於是朱錫珉率衆入河南，而黃益芸則率衆走山東。適此時曾立昌亦已奉令率部北伐，抵山東，黃會遂合力佔據曹縣，以衆寡不敵，被清軍打敗，曾立昌黃益芸俱戰死於黃河。

朱錫珉入河南，勢稍振，會鳳翔開芳被困於直隸，往援之，是時鳳翔已攻陷深州，距北京只有六百里。旣而被清將勝保所擊退，乃改襲天津，不克，退據靜海。更分兵屯駐獨流、楊柳青等處，以爲犄角之勢。時值大雪，南兵不習寒，又因軍糧不足，不獲接濟。於是林鳳翔自守連鎮，李開芳與朱錫珉率部合取高唐州。清軍見林李分兵，乃命僧格林沁率大軍圍連鎮，鳳翔因勢孤糧盡，軍士疲餓至不能舉戈矛，連鎮遂陷，林鳳翔英勇犧牲。連鎮既陷，僧格林沁乃移師圍高唐州，開芳錫珉以糧盡突圍進據馮官屯，僧格林沁不敢與戰，竟擱開運河水淹死太平軍，李開芳朱錫珉也。繼鳳翔之後，爲清軍所殺。

太平軍北伐的失敗，是由於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在戰略上沒有看清敵方主力，沒有集中自己的主力去摧毀滿清的最後堡壘——北京，沒有乘敵人慘敗之際，迅速殲滅敵人。當時僅僅派出林鳳翔李開芳數萬兵力去進行北伐，後來雖然繼續派了朱錫珉、曾立昌、黃益芸去應援，但兵力亦很少，前後

兩次出師，共計不到十萬人。而且當林李轉戰北方數省之際，並沒有不斷給他們以補充接濟，聽任林李孤軍深入，致犯兵家大忌，因以失敗。正像林鳳翔被捕後供辭所說：「吾孤軍深入，犯兵家之所忌，取敗宜也。且我爲漢族戰而死，死亦得所」。這幾句話說得多末慷慨沉痛！他們是真正爲漢族解放而戰，他們的鮮血是爲太平天國的理想而流，可是身當強敵，却沒有得到天京應有的接濟和補充，結果是因孤軍苦戰而失敗。他們爲漢族而戰死，死固得所，但是北伐軍一旦失敗，清廷即可重振旗鼓，集中力量來對付天京，這未必不是太平天國後來覆沒的一大因素。

林李北伐師出發後，太平天國以武漢爲天京上游，不宜委棄於清廷。於是東王楊秀清自將征湖北，任石祥貞爲前鋒。同時更分遣胡以幌等西攻皖贛，以爭長江上游。胡以幌與賴漢英等率師由江蘇入安徽，下桐城，破集賢關，於一八五三年五月再克安慶。八月陷九江，九月入湖北，是時太平軍秦日綱部更由安徽的桐城進逼廬州，胡以幌復率軍會攻，與清軍大戰，清軍健將江忠源戰死。而湖北的黃州亦有大戰，太平軍大破清軍，鄂督吳文燾死於亂軍之中。又敗清水軍，殺其統將唐樹義，遂乘勝於一八五四年元月復取漢陽。楊秀清命石祥貞率步兵越武昌而上，破岳州，而以漢陽兵攻武昌。五月石祥貞自岳州還，會攻省城，城中守軍饑疲，巡撫青麟無力固守，六月太平軍縋城而登，遂克武昌。時湘軍初興，初當大敵，陸軍敗於岳州，曾國藩自將的水師，也敗於靖港。「曾國藩自以兩次失敗，戰無希望，憤而投水，從者救之，得免於死，喪氣歸於長沙」（見陳恭綽著中國近代史第一五七頁），可見當時湘軍敗後狼狽的情形。

太平軍自克武漢，楊秀清即還天京，命石達開赴長江上游代督西征軍。一八五四年七月，湘軍訓

練成功。乘太平軍統帥調動的機會，猛力奪取岳州並進攻武漢。石達開一到蕪湖，即聞武漢失守。湘軍乘機進逼九江，便與太平軍名將石達開相遇。兩軍大戰，湘軍水師擊進，一部被封鎖於鄱陽湖內，內湖外江。湘軍水師被分隔，不能協同動作。陸軍也戰敗。太平四年十月，石達開部連克新昌、瑞州、臨江、安福、分宜、萬載、袁州、吉安，進攻南昌。清將周鳳山解九江圍，率勁旅數萬人往援。時達開兵才數千，餘兵盡分赴秀邑。左右都主張撤退，達開却不慌不忙一面張燈火於山谷間爲疑兵，同時趕快把自己的兵力集中起來。以疾風迅雷的速度乘夜猛撲清軍前進陣地——樟樹。清軍素來害怕石達開，見他星夜來襲，又不知他兵力究有多少，於是周鳳山部隊竟發生混亂。石達開就利用這個混亂，攻擊其另一部份，依然使用全力，弄得周鳳山部首尾不能相顧。這樣，石達開就把敵人各個擊破，因而得到勝利。這是兵法上以少勝多的巧妙運用。在戰術史上是一個光輝例子。

石達開打破了周鳳山，又和秦日綱聯合打敗了曾國藩。曾手下健將羅澤南因此戰死。於是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都爲太平軍所有，惟南昌、廣信、贛州、贛州、南安五郡未下。國藩孤軍居敵中，屢向湖北乞援，胡林翼乃分軍四千回援江西，於是國藩規復武漢的計劃，又生一挫折。

當一八五三年二月十日太平軍佔南京時，清軍向榮部亦自長江上游尾追至南京城外，受清廷命爲欽差大臣，駐軍於東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同時琦善亦受命爲欽差大臣，率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由河南進達揚州，當時揚州已爲林鳳翔所陷，琦善遂與內閣學士勝保，提督陳金綏分營揚州城外，是爲江北大營。當時清軍在長江下游與太平軍對峙着，採取防禦姿態，既不能阻止太平軍北出中原，也不能阻止西征軍沿江而上，去攻打並擊敗湘軍。

到一八五六年春，北伐戰爭雖已遭受失敗，而長江上游的反清戰爭，却在石達開指揮之下，着着勝利，大破湘軍。東王楊秀清並遣部將李秀成與陳玉成，兩路進攻江北大營，同年四月江北大營垮台，太平軍再克揚州。太平軍攻陷江北大營後，回師江南，進攻江南大營，於同年九月在鎮江附近大敗清軍，殺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向榮聞警，遣張國樞馳救，秀清乃悉調援師返天京，國樞亦返大營。秀清遂密約吳如孝率鎮江兵趨天京，掩向軍之背；更命溧水金柱關等處之兵，橫襲旁山。秀清自率勁旅，出通濟門，撲江南大營，先命悍將奪七甕橋以挑之，向榮悉出大營兵，赴前敵，併力截殺。太平軍忽敗退，向榮張國樞跟蹤追擊，離大營益遠，鎮江兵突至襲營，營中空虛，縱火焚之，守兵驚散，前敵清軍看見大營火起，知已中計，但已退無所據，倉卒亦潰。太平軍前後左右攻之，清軍死者數萬人，向榮張國樞逃至丹陽，八月向榮氣憤而死。

這一戰役的成功，是太平軍運用「強迫敵人改變陣容，調動並剪破敵人力量，切斷敵人歸路」這一戰略的成功。善用兵者，應使敵人糊塗，使它發生錯誤，使它驚惶失措，兵法上所謂「多方以誤之」，一能用敵變化而取勝者爲上策」。太平軍這一戰役的成功，或多或少受到這一上策的啓示。其後兩軍張國樞雖恢復瓜州鎮江，進軍秣陵關，復立江南大營，卒爲太平軍再度打垮。太平軍第二次打跨江南大營之後，即由丹陽攻下常州，蘇州，松江和嘉興，各地民衆響應者甚衆，而天京無圍師者二年。

楊韋事變以後的太平軍

當一八五六年春及夏初，太平軍在長江上游下游的進攻，沿着勝利，這時正可乘勝再興北伐之師，直搗北京，以推翻滿清政府，而建立民族獨立自由的新中國。然而，在這時候，忽然發生了太平軍內部的分裂，發生了一八五六年七月的楊韋事變，致有達開所說『吾儕以救世起義，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滿清），底定天下』的太平天國志願，不得不歸於流虛。

當太平天國建都南京時，天王洪秀全深居宮中，媚於聲色，口趨於墮落腐化。朝中軍政大權，幾全操於東王楊秀清之手。楊秀清起義有功，爲人精悍，善於用兵，但不免於驕矜，被同僚所嫉忌，尤以韋昌輝反楊最烈，因韋昌輝本爲商人豪族出身，祇想從中取利，不願革命深入發展，加以敵人奸細侯謙芳等從中挑撥，致楊韋之間時起磨擦。而天王亦心懷疑忌，不相信東王，於一八五六年七月，暗與北王韋昌輝合謀，計殺東王，並殺戮東王親信幹部一萬餘人。當時翼王石達開在安慶，聞變馳歸天京，責昌輝殘殺太甚。昌輝不悅，又謀殺達開，達開得悉，黑夜縋城逃出，回到安慶，而達開在南京的全家老小，竟被昌輝所殺害。達開至安慶，發兵靖難，天王畏達開，乃殺昌輝，把昌輝首級傳送達開，以謝達開。達開止兵，親往南京，與天王商議善後。這時天王又不信任達開，恐達開掌握軍政大權，竟任用私人，把政權交給無知無能的天王兄洪仁發，洪仁發去操縱，以牽制翼王。翼王既痛『外侮未平，蕭牆禍起』，又恐『此黨彼羣，尋仇未已』（均見達開復天王書），不願『捲入是非之

門」，乃自領將兵，西征湘黔川滇，雖然也相當牽制了清軍進攻南京的力量，但終究損害了戰略的協同。

因楊革事變，太平軍自相殘殺的結果，損失了革命的元氣，內部又發生了分裂，分散了兵力。並且東王死後，軍權不集中，指揮亦不統一。因之，太平軍由優勢開始變爲劣勢，由向上發展開始轉爲向下衰落。由戰略的進攻開始轉爲戰略的防禦。反過來說，楊革事變對於清軍和整個滿清政府却是有利的；因爲它替滿清政府削弱了太平軍的力量，客觀形勢便變得對清軍有利。曾國藩看到了這點，立刻決定了和開始了戰略的反攻，而且決定了戰略反攻的中心目標是南京。

湘軍爲着反攻太平軍，決定反攻的軍事計劃是：第一步先取武漢和九江，第二步得到安慶，第三步再從長江上下游及浙江三路圍攻南京。在楊革事變後三個月，即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湘軍即開始反攻武漢，湘軍在胡林翼指揮之下，於十一月克武昌，兩湖總督官文亦於同日攻克漢陽，湘軍反攻計劃的第一步得以部份實現。湘軍攻陷武漢後，分兵進窺江西，進兵九江城外，包圍九江的太平軍，至一八五八年四月，九江亦被湘軍攻下。從此形勢爲之一變，清軍由劣勢較快地轉爲優勢，由戰略的防禦較快地轉爲戰略的反攻，中間沒有經過比較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不能不說是楊革事變對清軍及整個滿清統治階級幫了很大的忙。

於是戰爭進入新階段，清軍的反攻計劃，在上游方面，以清軍曾國荃爲主將，反攻安慶。在下游方面，以和春、張國樞爲主將，反攻南京。太平軍的防禦計劃，在下游方面，以李秀成爲主將，保衛南京；在上游方面，以陳玉成爲主將，保衛安慶。這時候，石達開帶着一部份精銳的太平軍，已由浙

江轉江西，過福建，經湖南，入廣西，至一八五九年到了黔湘桂邊界地帶，已不能與長江上下游太平軍配合作戰，因此，太平軍甚感保衛南京與安慶的兵力不與與兵力分散。

但這並不是說太平軍在這以後就節節敗退了，不是的。太平軍就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也還創造了很光輝的戰史記錄。一八五八年五月，和春張國樑進逼南京，江南大營勢復振。是年六月，李續賓克九江，曾國荃克吉安，太平軍在江西之勢又墮。時湘軍作戰計劃：陸軍渡江，先皖北而後江西，水師先安慶而後南京。自七月至年底，清軍連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進取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兩方血戰，殺傷相當。而秀成玉成自廬州至，連營數十里，抄湘軍後部，李續賓敗死，而太平軍之勢力一振。但自江南大營再振後，南京復被圍，秀成乃與李世賢，陳玉成，黃文金，楊輔清，劉宮芳等百餘將領，開軍事會議於桐城縣東南之樞陽鎮，商討攻守方略，決定先取杭州，以斷張國樑餉道，使其分兵來攻，再返師出其不意擊之。

會後，李秀成即自率精銳千餘，襲破涇縣防軍，遂克旌德，二月，進攻廣德，泗安克之，由安吉武康進兵，很快就把杭州攻下。清廷聽到杭州危急，即令和春兼督浙江軍務，抽出包圍南京的五分之一兵力，派提督張玉良率領往援杭州，至則省城已破。李秀成知道這時清軍包圍南京的力量已經削弱，趕快率所部風馳而西，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各率所部會于東壩，並克溧陽，圍金壇。這樣一來，戰爭主動權又被太平軍扭轉回來。因為清軍包圍南京的大營兵力十幾萬人，每月需要糧餉百餘萬兩，完全靠蘇浙供給。現在杭州既被太平軍攻下，蘇杭一帶都變為太平軍的活動範圍，清軍大營的糧餉就沒有了着落，兩月不能發餉，兵士戰鬥力立刻減低。後來清軍聽到蘇州告急，又抽出大營兵力去常州

應援。李秀成抓住了這個好時機，立刻回師天京攻清軍大營，清軍發生兵變，王浚軍先逃，和春部下繼之，清軍大營幾乎全軍覆沒。和春狼狽走丹陽，張國燾頓足而嘆曰：「八年心力，不圖敗於李秀成之手」，亦收拾殘部退守丹陽。李秀成不讓他們安營，率十萬兵員追到丹陽。國燾拒戰，竄死亂流中，和春亦嘔血死。時張玉良回救江南大營不及，與太平軍戰於常州，又大敗。於是清軍江南圍師三百餘營，悉夷爲平地，連下常州、蘇州而太平軍的勢力又爲之一振。

這一戰國的勝利，證明李秀成保衛南京的戰略計劃，完全正確，因爲它不是消極的陣地防禦而是積極的運動防禦。同時在實際運用中，證明李秀成領導藝術的成功，真不愧爲天才的戰略家，因爲他真正做到了戰略學上的四大原則，即：（一）強迫敵人改變陣容；（二）分散並剪滅敵人的力量；（三）切斷敵人的給養線；（四）切斷敵人的歸路。當時的形勢，清軍精銳都集中在南京城下，十幾萬大軍好像錢桶一棧包圍着太平天國京城，如果太平軍採取消極防禦路線，提出「不許離開根據地一寸土地」的愚蠢口號，和清軍作陣地對戰，必然要大大吃虧，像太平天國後繼者所曾遭受的一樣，有了後面這一失敗的經驗，更加反映出李秀成的偉大。

但是，由於楊韋事變的惡果，清軍反革命力量的增長，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總趨勢已經走向下坡，所以李秀成這一偉大的成功，也祇能暫時挽救太平天國的命運，而不能根本扭轉大局的發展。這時湘軍淮軍等反革命力量是一天天增長，而外國侵略者亦開始援助清軍的反攻。當一八六〇年春，江南江北大營圍困南京時，長江上游的湘軍亦於同時反攻安慶，戰爭甚爲緊張。湘軍於一八六一年春夏間，屢敗陳玉成援安慶之師，多隆阿又敗之於桐城西南的蕪車河，鮑超再敗之於安慶北境的集賢關，

綜觀太平天國十五年反清戰爭的經過，不僅在政治上開闢了人民戰爭的新道路，使當時在滿清政府重重壓迫之下的苦難人民武裝起來反對武裝的革命，進行要求自求解脫與中華民族自求運動的正義戰爭。而且在當時歷史條件之下，創造了許多新的軍事組織與作戰方法，在戰略戰術上給了我們許多有益的經驗。本來，戰爭是用流血來解決的重大利害底衝突，是政治用另一手段的繼續。而『政治即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祇有在這裏才發生嚴重的政治』。『一切民族壓迫會引起民族底廣大羣衆的反抗，而被壓迫民族人民底一切反抗的趨勢就是民族起義』。太平軍在金田村所發動，正是這種民族起義的猛烈火花。

戰略的結論

王成驤將劉璋林被擒，精銳損失殆盡。一八六一年八月，曾國荃以地雷破安慶，守將葉芸來以下戰死者一萬六千人，陳玉成全家焚死，乃退走廬州，又爲多隆阿所敗，因此時太平軍東西兩方軍事的連絡已被截斷，陳玉成卒忠勇被殺。

這時太平軍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勢力異常猖獗，加以外人幫助李鴻章訓練的常勝軍，已直接參加太平天國的戰爭，而太平天國的力量，則一天天削弱下去，漸至不能支持，到一八六四年一月南京失陷，洪秀全李秀成相繼死難，於是堅持十五年的太平天國反清戰爭，不幸竟以失敗而結束。

大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之本來的動機就是政治目的」。『這個政治目的就成爲尺度，也適用於戰爭行動底目標上，也適用於發揮力量底必要程度上。不過，政治目的，單獨靠自己，還不成其爲尺度。要聯繫到敵對的國家雙方，因爲政治目的會影響到敵對的國家雙方。只有政治目的影響到大衆的時候，才成爲尺度。因爲政治目的必須動員大衆，因此，必須考慮大衆底性質。同一個政治目的，會跟着國內大衆裏面有加強行動的原理，或有削弱行動的原理，而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見克氏所著戰爭論第一章十一節）。

克勞塞維茨是不敢直說的民主主義者，他所謂『大衆裏面有加強行動的原理』，就是民主的原理；反之，他所謂『削弱行動的原理』，就是反民主的原理。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在民主的原理之下發動起來的；反之，滿清政府剿滅太平天國的戰爭，却是在反民主的原理之下進行的。所以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在第一階段非常順利，而滿清軍隊則節節敗退。但是太平天國的民主原理並沒有貫徹到底，在戰爭中途發生楊韋事變，由於自相殘殺，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再加上其他的不利因素，就不得不由戰略的進攻轉爲戰略的防禦，以至完全失敗。

克勞塞維茨又說：『因爲戰爭在現實的國家生活裏面，接觸着許多事物，許多力量和許多關係底複雜錯綜，因爲戰爭有各種矛盾磨擦，有各種異質的要素混雜在內，這些異質的要素，有它們的笨重性（座力）和抵消作用，有各種可能性和蓋然性底周轉曲折，各種僥倖，同時有種種恐懼怯懦等等阻礙着戰爭底自然傾向之絕對無比的徹底發作，所以戰爭之邏輯的一貫性就受到妨礙，抽象的戰爭概念底邏輯的前進運動，就只好停頓在那些東西底複雜錯綜和周轉曲折之中，不能簡單地達到理應當然的

結論」。『這種邏輯不澈底性或雙方都有，或者一方獨有。總之，戰爭就會顯露出不是理應當然的形狀，反而成爲不澈底的缺乏一貫性的東西』。這在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發展過程中，也可得到充分的事實證明。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之政治目的本身的研究，不能在這裏展開。本文的任務，只想在太平天國戰史的綜合研究中，求得一點戰略戰術的經驗和教訓。這種經驗和教訓，在前面戰史的簡括敘述中已經有了一些交代，現在再概括結論幾句。

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因爲在本質上是農民戰爭，所以它在軍事上比較長於游擊戰與運動戰，它知道爭取主動和向阻力最小的地方進軍。在戰略上最有價值的幾次戰役就是馮雲山所指揮的突圍永安州之役；拾桂林而攻興安全州之役；楊秀清所指揮的拾長沙而攻岳州武漢之役；石達開所指揮的襲擊樟樹之役；楊秀清李秀成所指揮的幾次打破江南北大營的戰鬪，特別是李秀成所計劃和指揮的遠襲杭州以解天京之圍，並進而殲滅清軍十餘萬兵力的有名戰鬪，不僅給了清軍以出乎意外的打擊，爭得了太平天國反清戰爭的勝利，或挽救了自己的不利局勢，使清軍失去主動地位，而且創造了許多軍事戰略上的成功記錄。

革命的創造，變革了所有的用兵制度，改正了所有的陳舊的戰爭方法與舊習慣，廢棄了舊式的軍隊而創造了嶄新的人民革命軍和嶄新的戰爭方法。這種創造不能單純地了解爲洪秀全，馮雲山，楊秀清，石達開，李秀成等少數太平領袖的自由意志的產物，而應當進一步了解爲當時廣大農民與手工工人，進步知識份子，在解放鬪爭中的羣衆創造。

當然，這並不是說太平天國在軍事戰略上就沒有錯誤的地方，決不是的。太平天國反清戰爭雖然發展到這樣大的規模，堅持了十五年之久，但結局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自然很多，而軍事戰略上的弱點和錯誤，也正是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平天國反清戰爭在戰略上的最大錯誤，就是在攻克南京以後，沒有立即派遣主力北上，猛撲天津和北京，以適應當時順利的客觀革命形勢，摧毀滿清中央政府，使滿清統治者根本失去恢復或重振力量的可能，然後再回師掃蕩華中華南，以澈底掃除滿清力量和封建統治。太平諸領袖沒有懂得戰略的指導任務，在於決定主要的打擊方向，採用一切方法去摧毀敵人的主力，直到剝奪敵人的一切抵抗力。太平諸領袖沒有懂得這一要素，所以在攻克南京之後，竟以主力去恢復長江上游，而祇派出林鳳翔李開芳一個支隊去進行北伐，結果徒勞無功。事實上，當時北方各省正被捻黨暴動所瀰漫，滿清政府正在動搖之中。如果太平軍在佔領南京之後，不是祇派一個支隊北上，而是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主力去實行北伐，並與捻黨取得聯合作戰的同盟關係，要打北北京滿清中央政府是完全可能的。

同樣，李秀成在後期作戰中，雖然創造了像我們上面所說「遠襲杭州解圍天京並進而粉碎和春張國樞兩部兵力」的成功記錄；然而在這次勝利之後，却也犯了一個戰略錯誤，就是李秀成在擊潰和、張兩部之後，沒有立即回師長江上游，援救陳玉成保衛安慶之師，而反急其所當緩的兩次進攻上海。沒有看清擊潰和、張兩部清軍之後，清軍已潰不成軍，無力威脅南京，而上海李鴻章的淮軍，根本還沒有建立，亦無威脅南京的危險；而長江上游的戰爭，却甚為緊張，安慶有重新失去的危險，陳玉成搶救安慶之兵，幾次遭受挫折，這時曾國藩的湘軍事實上已經成爲反對太平軍的主力，李秀成沒有權

得太平軍這時候的戰略主攻方向，應該是湘軍而不是上海，沒有按照這個戰略原則去部署力量 and 指導戰鬪，結果就陷於後來兩面被夾攻的不利局面。

太平軍在軍事戰略上的另一錯誤，就是當形勢不利時，沒有組織適當的退却，並放棄太平軍所擅長的作戰方法——運動戰，而消極地陷於陣地防禦，以致被敵人所撲滅。這一點，李秀成是看到了的，他見華浙一失，即知不能持久，曾勸洪秀全「親征鄂贛，據上游以號令天下，襟帶江浙以利餉源」。可惜洪秀全這時早已失去革命朝氣，不肯採納李秀成的建議。而當時李秀成的政治魄力，也還不足挽狂瀾於既倒，結果就陷於失敗。

我們從上面簡括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到一個總的戰略結論。即：戰爭終究是兩方力量的總決賽，勝敗雖說是兵家常事，而最後勝利的取得，却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和根據。特別是戰爭一經延長，兩方的戰爭，就不會限於前線的斷殺，而必然貫徹到兩方都想儘量消耗敵人與努力生長自己力量的圓爭。因為戰爭既然是力量的決賽，不倒倒敵人，就有被敵人打倒的危險；不實事求是來求得力量的增長，也有被敵人消耗到無力支持的危險。而要打倒敵人，就必須盡量增加自己的力量（不僅是軍事力量，同時也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等力量在內），到足夠壓倒敵人的程度；才能殲滅敵人，或完全剝奪敵人的抵抗力。這樣，一方激動着另一方，另一方也激動着對方，這裏的主要關鍵，就看指導戰爭的兩方，誰在戰爭過程中生長力量最多，消耗敵人最大，誰就有爭得最後勝利的把握。

當然，所謂生長力量，決不是一句空話，而包涵着最真實的內容。它一方面要受戰爭性質與指導戰爭的政治原理所制約，另一方面又要看條件的運用與努力程度來決定。借用德國大軍事學家克勞塞

維茨的話來說：『戰爭必須動員大眾，要動員大眾，就必須考慮大眾的性質。要看大眾裏面有加強行動的原理呢，或有削弱行動的原理？假若大眾裏面有加強行動的原理，那麼戰爭威力也就跟着加大。不過這種加強行動的原理，還須要使之達到真正邏輯的發作』。可見有了生長力量的良好條件，還須要有真切的認識與合理的運用，才能使加強行動的原理，由理想變成現實。太平天國反清戰爭是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得到廣大農民羣衆、手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擁護和參加，合乎『加強行動』的原理，所以取得了初期戰爭的節節勝利。但是太平諸領袖沒有把這種『加強行動』的原理，加以充分運用和貫徹到底，有了天朝田畝制度等等進步的政策和主張，卻沒有真正去實行，因此也就沒有能夠更明確地去團結羣衆，更沒有採用民主方法去發掘民衆的潛在力量，來擁護戰爭和參加戰爭，以致有了『加強行動的原理』，棄置不去運用；甚至發生楊韋不幸事變，實行自相殘殺，以致敵人竊笑，志士寒心，石達開負氣出走，李秀成陳玉成等忠勇幹部，亦未能自由發揮其才能，而貪官污吏如洪仁發洪仁達，則盤踞要津，等於替滿清政府在太平天國內部來破壞團結和消耗力量。這就使滿清政府從危急中救出自己，而以太平天國廣大隊伍的鮮血爲代價。歷史的錯誤不適當重複，我們研究了太平天國的失敗經驗，更應痛切反省和加強努力。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著作者 范 文 瀾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定價三五〇元
一一五〇〇〇

1948
2
4/32

類號

正 1.31

4 1/1



7.74
5

天國革命運動

月初版 共 1--8000.

定價：350元